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0 年 8 月刊 • 第 8 期（总第 47 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重磅推出

公共文化“云”上建

■ **“大系”平台**

大系八月“留痕”

“千年古县 • 干宝遗风” 学术研讨会再征文

■ **学术视野**

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回溯

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传承

■ **文化实践**

家家乞巧望秋月，牵牛织女渡河桥——“我们的节日”七夕系列活动综述

目　录

■ 思想前沿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重磅推出.....1

公共文化“云”上建.....3

■ “大系”平台

大系八月“留痕”.....4

中国北方民歌那达慕草原搭台.....41

“千年古县·干宝遗风”学术研讨会再征文.....43

·各地推进动态·

驻马店故事编纂全天候 半封闭.....46

深挖民间谜语资源，拓展编纂工作思路——《大系·谜语·河南卷（三）》附录编纂工作会在三门峡召开.....47

“济南故事分卷”借东风巧扬帆.....48

甘肃《大系》《集成》编纂双管齐下.....49

以点带面，全力推进——安阳分县区启动传说、故事卷.....51

奋马扬鞭疾向前——黑龙江故事卷取得阶段性成果.....54

辽宁卷说唱卷观照历史.....54

■ 学术视野

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回溯（刘建波）.....59

·论文推介·

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传承（宁梅）.....63

民歌视角下京津冀地区民间刺绣的艺术原型研究（滕雪梅 王熠）..69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理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编辑人员

覃　奕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 号院 32 号楼 B308

投稿邮箱

mjwydt2016@163.com

电　话

010-59759244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2020 年 9 月

■ 文化实践

·国内信息·

家家乞巧望秋月，牵牛织女渡河桥——“我们的节日”七夕系列活动综述.....74

“工艺集成黑龙江卷”调研聚焦鄂伦春民间工艺文化.....76

质量进度“两手抓”——《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青海“汇总大数据”.....78

贵德“天地人” 细说“六月会”.....79

重走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之路.....81

民协移动会客厅标配“互联网+民间文艺”.....82

脚下有泥 心中有底——甘肃河西走廊民间文化资源富集.....84

·国际信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化国家文化遗产法律数据库.....86

巴中国文化交流新期待.....86

思想前沿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重磅推出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指出，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要深刻把握“都”与“城”、保护与利用、减量与提质的关系，推动政务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老城整体保护与有机更新相互促进，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

《批复》要求，要突出政治中心的服务保障，强化“两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结构，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注重街区保护更新，突出改善民生工作，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维护核心区安全，坚决维护《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其中，在强化“两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批复》明确，要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城市形象。长安街以国家行政、文化、国际交往功能为主，体现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形象气质。中轴线以文化功能为主，是体现大国首都文化自信的代表地区。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使之成为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区。沿二环路建设展示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化首都风貌的公园环。加强空间秩序管控与特色风貌塑造，保护好传统文化基因，通过对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的精细引导，形成承载传统风貌基调的眺望景观、城市色彩与第五立面，展现千年古都菁华、东方人居画卷。

在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方面，《批复》明确，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是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全国文化中心最重要的载体和根基。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坚持“保”字当头，精心保护好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加强老城空间格局保护，保护好两轴与四重城廓、棋盘路网与六海八水的空间格局，彰显独一无二的壮美空间秩序。以高水平的城市设计强化老城历史格局与传统风貌，形成传承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庄重典雅的空间意象。扩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保护好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老字号，保留历史肌理。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抓手，带动重点文物、历史建筑腾退，强化文物保护及周边环境整治。涉及的中央党政机关及部队驻京单位要带头支持，统筹做好文物保护、腾退开放和综合利用，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保，向社会开放。

在注重街区保护更新方面，《批复》明确，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减量提质要求，保护历史文化底蕴，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根据街区功能定位和风貌特征，分类施策，按照历史保护、保留提升、更新改造 3 种方式，有序推进高质量街区保护更新。

据了解，《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出的 9 类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基础上，突出老城文化遗产特色，进一步新增 5 类保护对象，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区 11 类保护对象，包括：（1）世界文化遗产；（2）国家级、市级、区级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又称普查登记在册文物）；（3）地下文物埋藏区；（4）历史建筑（含优秀近现代建筑、名人旧居、挂牌保护院落、工业遗产等）；（5）历史文化街区和特色地区；（6）历史街巷、传统胡同及传统地名；（7）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产；（8）城址遗存；（9）历史名园与古树名木；（10）革命史迹；（11）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依托胡同街巷，分区域建设主题鲜明的 10 条精品探访线路，包括：（1）中轴线文化探访路；（2）玉河—什刹海—护国寺—新街口文化探访路；（3）南锣鼓巷—雍和宫、国子监—地坛文化探访路；（4）东四—南新仓—日坛文化探访路；（5）月坛—白塔寺—西四文化探访路；（6）皇城文化探访路；（7）环天安门广场—前门大栅栏文化探访路；（8）新文化街—宣南文化探访路；（9）天坛—先农坛—天桥文化探访路；（10）白云观

—三里河路—北京展览馆探访路。

（转自《中国文化报》，原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 2020 年 8 月 28 日）

公共文化“云”上建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获悉，国家公共文化云改版上线。新版国家公共文化云按照安全、便捷、权威、丰富、开放的原则，坚持用户导向，突出全民艺术普及服务功能，着重构建以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订场馆、读好书、赶大集六大功能为核心的全民艺术普及云服务体系。

看直播板块重点推送群众文化活动、专题讲座、艺术普及分享、展览带看、馆藏讲解展示、非遗讲解展示等资源，计划每年推出直播不少于 500 场，发布各类资源不少于 7500 小时；享活动板块汇聚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的全民艺术普及品牌活动；学才艺板块推出八大基础门类课程，提供在线培训、课程点播、在线直播、作品上传、互动社区等服务，每年将为 800 万用户提供艺术普及培训服务；订场馆板块主要采集、审核、发布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相关机构、场馆的基础信息及活动信息；读好书板块将逐步建成全国最大的全民艺术普及图书数据库；赶大集板块则依托全国及区域性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平台，开展文化内容生产、决策咨询、公共文化设施运营与管理、第三方绩效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公共服务等产品交易，开发文创产品，促进艺术普及、文创消费。

据悉，国家公共文化云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具体建设的网络平台。2017 年开通以来，该平台在面向基层提高供给效率、打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已成为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

（转自《中国文化报》，原题为“新版国家公共文化云上线 构建全民艺术普及云服务体系”，2020 年 8 月 26 日）

大系八月“留痕”

编者按：为积极落实大系出版工程的宣传工作，交流与推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各分卷编纂工作经验与调查研究成果，推动各地编纂工作协调发展，扩大民间文学影响力和社会宣传影响力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协与《文艺报》联合开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专版”，已于2019年刊发大系出版工程10个系列的宣传文章，2020年6月及其后每月将继续刊发专版内容。其中，8月专版涉及谜语、史诗和长诗，并行的征文主题为“编纂和开发《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普及读本、对外宣传推介产品和衍生产品，如何发挥和落实民间文学在基础教育、素质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下7篇文章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原文刊发于《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第6、第7版），由于版面有限，报纸登载的是删节版，现将完整版呈录于此，供参考交流。

从河南谜语看谜语的符号学特征

苏德友[1]

谜语和灯谜在创作上都用隐喻手法，但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看，谜语和灯谜符号意指系统有本质的区别：谜语的符号学特征属于外延符号系统，所谓外延符号系统就是符号系统的平面不含符号系统；不像灯谜符号系统，不是符号的表达平面也是一个符号系统（谜面别解），就是内容平面也是一个符号系统（谜底别解），甚至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都有一个符号系统（面底双别解）。所以有必要以河南谜语典型谜作为例，对谜语的符号学特征，以及谜语谜面隐喻表达方式等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一、谜语的符号学特征

[1] 苏德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特约编委，宁夏区民协灯谜学会会长。

谜语的符号意指系统较少曲折，借助谜面的像似符，直接传达谜底的概念。笔者试从四个方面说明谜语的符号学特征。

1.谜语符号能指、所指的意指关系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如果用这种二元方式分析谜语的结构，那末，谜面就是能指，谜底是所指。

举《河南谜语》中的一首谜语说明：

弯背弓弓，胡须松松。杀杀没有血，烧烧满身红　　虾

能指　　所指

谜面抓住了虾的形象特点和烹炸前后色彩的变化，“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描写是能指形象，所指的是谜底“虾”水产品的概念，我们眼前似乎看到了“虾”的整体实物。

2.谜语谜面的再现体是像似符，意指系统到“对象”终止

索绪尔的二元语言符号学的所指，在皮尔斯符号学那里被分解成为对象和解释项，即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皮尔斯对符号有好几种三元分类方式，其中一种是将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皮尔斯说：“像似符是这样一种再现体”，“它仅仅借助自己的品格去指称它的对象，并且无论这种对象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它都照样拥有这种相同的品格……这只是因为它像那个东西，并被当作这种东西的符号来使用”。

若用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构造”分析，谜面是谜语符号的再现体，这个再现体的符号性质是像似符，由于谜语直指性质的限定，谜语的谜底没有展开到“解释项”，止步于“对象”这一步。换句话讲也就是，它将“对象”和“解释项”合二为一个“所指”。举一条河南临汝的谜例：

两口袋一般长，里头盛着万人粮。文武百官都吃到，朝廷也要尝一尝　　乳

再现体　　对象 解释项

这条谜语的谜面再现体用了像似符，将乳汁隐喻为粮食，将乳房隐喻为装粮的口袋，谜面后两句隐喻出乳房养育所有人，包括文武百官甚至皇上的功能。谜面再现的对象是乳（房），到此为止，也只能到此，因为“乳”的概念包括了与乳相关所有东西。

3．谜语从谜面到谜底没有变义

谜语从表达平面到内容平面在语义上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谜面喻体表现出来的，和谜作者所要表达的本体是同一个东西。如河南荥阳的谜语：“一母所生弟兄多，先生兄弟后生哥；先生兄弟当门事，有了大事寻哥哥（谜底：牙齿）。”谜面虽然用了拟人化手法，但其描述再现的是牙齿的生长过程和功能。谜面中的“大哥”指智齿，俗称“大牙”，萌出时间在最后。谜面中的“当门事”指门牙的功能，而门牙虽生出的早，却是“小弟弟”。

关于牙的这条谜语，用拟人手法类比牙齿，隐喻的目的十分坚定，自始至终要惟妙惟肖地再现出牙齿方方面面，没有别的意思。

这条谜语所用的“隐喻”没有变义，只是为了回互其辞换了一种表达的话语，实际上还是直指。关于隐喻，希腊古代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两者属于一种对比关系。语言学家李幼蒸在总结了许多关于隐喻的说法后也说，“在隐喻的众多说明中，共通的一点是认为，隐喻乃为用一种形象取代另一种形象而其实质意义并不改变的修辞方法”。

4.谜语符号的异型同质性质

谜语符号从谜面到谜底，是异型同质的符号学表达。谜语的谜面从表面用语上看，所用的隐喻似乎不是说谜底某物，实际上这些隐喻或性状上，或功用上，或心理上，在整体上表达的正是谜底事物的概念。

如《河南谜语》中的谜：“头小肚大足三双，烂州城里有家乡。缝州城里生下儿和女，肉州城里去打粮。手州城里得了病，挤州城里一命亡（谜底：虱）。”谜面借彼物（人）喻指此物（虱），用类比的方式指称谜底 。这条谜语和其他所有谜语一样，谜面喻象示猜谜者的是“假象”，与谜底本象有不同，是喻体和本体形式上的偏离，造成了谜语底面间的异型形态。然而谜作者所用隐喻的真实意图是要表现本体对象，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造成了谜语的异型同质性质。

关于异型同质的语言，雅柯布森曾举出两个例子。指称对象同为拿破仑的，出生在科西嘉的拿破仑、做皇帝的拿破仑、流放圣海伦娜岛的拿破仑，虽时间境遇不同，但均指拿破仑。指称对象同为蝴蝶的，有毛虫、蛹、蝴蝶，因不同生长期而形态不同，却都指蝴蝶。

还有一种隐喻方式也是谜语中常用修辞手段，这就是“博喻”。博喻在汉语中也称为

“连贯比”“连珠比喻”或“复喻”，即运用一连串喻体对本体进行多维度的、多角度的描述，反复设喻，加深印象，提高艺术感染力。博喻是谜语符号异型同质性质的典型。

如开封的谜语，“一人坐着，二目无光，三声不响，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脉清净，七窍不通，八人不要，九久无用，十是传家之宝（谜底：人影）。”谜面从坐相、眼神、声音、动作、面相、六欲、七情、思想、功能等十个局部异型侧面，综合刻画了与真人样子既偏离又相似的同质现象——人影。

二、谜语符号隐喻的几种类比方式

隐喻是基于语言学的类比，“类比必须有一个模型和对它的有规则的模仿。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索绪尔语）。由于是对事物的模仿，自然就不是事物本身，否则就成了照镜子或照相，不是像似，而是丝毫不差的原形了。所以，谜语的谜面和谜底（谜作者所要指称的概念）又存在着语义冲突或偏离。

谜语的谜面是喻体，谜语的谜底是本体，谜语的喻体和本体之间，具有相似性，常用已知的喻未知的、熟悉的喻不熟悉的、简单的喻复杂的、具体的喻抽象的、通俗的喻科学的，从而完成比拟相似的过程。谜语的这种类比关系，总结起来有形状相似、功能相似、心理相似、性状和功能均相似几种情况。

下面就谜语所用隐喻采取的几种类比方式，举谜例简要说明。

1.形状相似

如内乡的谜语“论粗一把，论长一拃。用手一摸，疙哩疙瘩（谜底：包谷穗）。”谜面所述之物形状、手感与谜底包谷相似。开封的谜语“红门楼，白院墙，里头坐个耍二郎（谜底：嘴）”。谜面红门楼指称红嘴唇，白院墙指称两排白牙齿，里头坐个耍二郎指称摇来摇去的舌头，三句话合起来就是嘴的形态。临汝的谜语“粽子头，梅花脚，屁股挂着指挥刀，坐时反比立时高。（谜底：狗）”谜面从狗头、狗脚、狗尾巴，以及狗的坐姿站姿高度比较，描写狗的形象特点。

2.功能相似

如潢川的谜语，“有风身不动，一动就生风。人间不用我，要等起秋风（谜底：扇）。”谜面所描写之物和谜底扇子在功能上极为相似。南阳的谜语，“一个庙，两头翘，光屙屎，

不屙尿。（谜底：鸡）”谜面除了描述鸡的一般形象外，重点抓住了未见过鸡排尿的功能特点（其实，鸡是撒尿的，它的尿液因水分再次被吸收而成半固体状，常与粪一起排出）。南阳的谜语，“小庙一间，门口朝天。和尚进去，泪珠不干。（谜底：夜壶）”夜壶是现在所称的男用小便器，谜面前两句具有一般壶的特形，后两句形象地从和尚流泪与男性排尿器官排尿功能上的像似特点。

3.心理相似

如临汝的谜语，“一天到晚，站在门前。有人相我面貌，便是老板的财源（谜底：店家招牌）。”谜面描述的是无利不起早店家的心理，像似于谜底店招招财生财的心理。还有通许的谜语，“穷亲对富亲，说好就订婚。过时不娶我，毁了婚书嫁别人（谜底：当票）”。谜面准确地拟人心理描写，和旧时当票在当铺老板心中的看法何其像似。

但是，潢川的谜语，“莺莺病了挽个鬟，张生看病打把伞。红娘煎药端药碗，老夫人气得瞪着眼（谜底：荷）”。虽然通篇都是心理描写，其实是通过生动地心理描写造成的形象相似。

4.形象与功能相似并用

如下面几条河南谜语：南阳的，“一间房，两头尖，坐下人，搁不下砖（谜底：眼睛）”；潢川的，“头戴红顶子，身穿花衣服。早晨喔喔喔，唱到太阳出（谜底：公鸡）”；潢川的，“有甲无盔，有眼无眉。没腿会走，有翅难飞（谜底：鱼）”；南阳的，“一物只有三寸长，小妞用它在绣房。夜至三更流红水，只见短来不见长（谜底：蜡烛）”。这四条谜，无论是人体器官、动物，还是日用品的谜，谜面前两句都是说谜底的形象，后两句说谜底的功能，从形象和功能两个方面描写面底间的相似。

三、事谜的符号学特征

一般将谜语的范畴定为物谜、事谜和字谜三类（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前面主要说了物谜的符号学特征，那么，事谜在符号学上又如何呢？

事谜在符号学上的表现，也与物谜的表现大同小异，也具备能指、所指的意指关系的特征：谜面是像似符，意指系统到“对象”终止，从谜面到谜底没有变义，以及符号的异型同质性质等。只是事谜谜底的概念常为一个行为过程和/或这个过程留下的迹象，较物

谜稍微抽象一些。

比如通许的这条谜语，“嘴对嘴，对嘴开，轻轻提出美人来。美人落口多滋味，遍地梅花开又开（谜底：瓜子）”。原底“瓜子”，是干果食品。谜面用爱情描述的方式，隐喻“嗑瓜子”这件事情。原底“瓜子”，是干果食品。笔者认为此谜应是事谜，属饮食行为。

有时候，事谜表现的是一种现象，或是自然现象，或是人为现象，如“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水里都不见（雨）”，是下雨的自然现象过程留给人们的印象。而息县的谜语，“野地里，两条绳，一下撒到北京城（谜底：车辙）”，是人为过程留下的迹象。

事谜的喻指好多存在模糊性，不像灯谜谜底那样确定和惟一。但模糊性作为谜语的一个特点，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因为有时候，“模糊观念要比清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康德语）。正如上面的“嗑瓜子”事谜，原谜归为物谜类，“雨”谜就“雨”而言是物，而把它动词化，标目为自然现象。“车辙”谜的原谜目定为“地理”太宽泛，若定为交通现象，还是太泛，再缩窄范围，则近于告诉猜者谜底。所以，这些谜都采用了模糊性概念。

河南民间字谜创作手法初探

任建明[1]

民间谜语按谜底的不同形式，可以分为物谜、事谜和字谜三大类。在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流传于河南民间的字谜，民间字谜的数量超出想象。这些民间字谜在艺术上的特色与物谜、事谜基本类似，可概括为：谜面内容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短语歌谣、诗词歌赋等），修辞手法十分丰富，有比喻、夸张、比拟、排比、典故、反复等。谜面的设置通常暗含机关，极力掩盖谜底答案而又极力彰显谜底特征，让人们在猜射过程中感受到其中的精妙趣味。从河南民间字谜的生成环境来看，字谜的设置来源于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生活艺术，具有浓厚的民间口头艺术色彩。

一、河南民间字谜的创作形式

民间字谜的创作，运用了多种方法，如离合、象形、谐音、方位、包含、借代、会意

[1] 任建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副主编，河南省民协灯谜学委员会秘书长。

等。有单用的，也有联合运用的，多种手法的联合运用，赋予了民间字谜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

（一）离合法

离合法又称增损法、拆字法。是利用汉字的笔画、部件进行加工改造，改变字形，通过增添、减损、分离、拼合等方法构成新字的制谜方法。如“磨”字谜：

一点一横长，

一撇到南阳。

并排两棵树，

长在石头上。（采录地区：南阳）

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字谜，不同版本中“南阳”有时作“南洋”。通过笔画、偏旁的合并，组合成谜底“磨”。

离合法有一种谜底叫入叫出的形式，它利用汉字可以分拆拼合的特点，对谜底的文字形状、笔划、部首、偏旁进行增损变化或离合归纳，使原来的字形发生变化，由谜底增损以切合谜面。由于此法综合了“添补”和“剪裁”二种技巧，谜中含增含损，叫入叫出，故须仔细推敲斟酌，才能求得谜底。例如“门”字谜：

有马就猛冲，

有口就请教。

有人就打雷，

有心就烦恼。（采录地区：陕县）

本谜为谜底叫入法。“猛冲”“请教”“打雷”“烦恼”分别会意出“闯”“问”“闪”“闷”，假设谜底为X，应用谜底叫入法则“X+马=闯”“X+口=问”“X+人=闪”“X+心=闷”，综合以上分析，很容易得出谜底“门”。

（二）象形法

象形法是将字的某个部件、字素的形状想象成生活中物体的形状，据以敷演成谜的制谜方法。猜这类谜，可以不考虑谜底文字的意义，而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根据谜面文字所描述的形象去联想出形象化的谜底来。如“兴”字谜：

三个蛤蟆爬上岸，

两个蝌蚪底下站，

如果你要猜对了，

保证叫你喜满面。（选自任敦新《中华谜歌大观》）

首句中“三个蛤蟆”象形“兴”字上面的三点，“兴”字中间的“一”象形河岸。次句中“两个蝌蚪”象形“兴”字下面的两点，末句是对谜底“兴”高兴意思的解释。

（三）谐音法

谐音法是利用汉语同一读音往往有多个形义不同的汉字的特点，采取声东击西，偷梁换柱的手法，假借此字之声音、而指彼字之形义，从而达到面底相扣之目的。谐音法有意把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或句子用在双关语中，以造成某种修辞效果的做法。例如谜底为双字“平常”的一首谜：

道士腰里两个蛋，

和尚脚下一根筋，

虽是平常两个字，

难坏不少读书人。（采录地区：南阳）

这首谜采用的是谜面谐音。“道士”本是道教的神职人员，这里谐音为“倒士”，即一个颠倒过来的“士”字“干”，“两个蛋”象形两点，与“干”合为“平”。“筋”谐音“巾” ，与“尚”组成“常”，至此谜底“平常”已水落石出。第三句欲擒故纵，向猜谜人明说谜底是“平常”二字，其实是一种障眼法。

（四）方位法

文字笔画有左右上下，内外边角之分，谜面上指出方位，撷取部分集成谜底。方位法字谜贵在谜面通顺，技巧自然，撷取部分无斧凿痕迹。方位法成谜有完全方位法和部分方位法，部分方位法其实是一种综合法，夹杂有会意、提音、象形等技法。例如下面的“一”字谜：

上不在上，

下不在下。

不可在上，

且宜在下。（采录地区：扶沟、西华）

这是一首纯方位法的字谜。四句谜面反复提示谜底字的方位构成——“上”字不在上面，“下”字不在下面，“不”“可”二字在上面，“且”“宜”二字在下面。

（五）包含法

包含法是从谜面的文字中找出共同包含的笔画或部首作为谜底的一种成谜方法。例如“口”字谜：

商周有，尧舜无，

唐虞有，汤武无。（选自任敦新《中华谜歌大观》）

“商周”二字中都有“口”字，“唐虞”二字中也都有“口”字，故谜底为“口”。

（六）会意法

会意法是从谜面上的文字（包括字、词或句）可能具有的含义去领会、联想、推敲、探索谜底，使谜面谜底经过别解按某种特定的含义相吻合。例如下面的“午”字谜：

一头黄牛没有头，

天天来了天天走，

要想见它也容易，

必须等到日当头。（选自任敦新《中华谜歌大观》）

首句从“午”字的字形上看，像一头无头的“牛”。从“午”的字义上说，“午”指白天中午的阶段，每天来，每天走，“日当头”恰是正午时分，从而会意出谜底。

（七）计算法

计算法就是把谜面中的数字通过算术运算，从而得出谜底的一种成谜方法。这种方法或加或乘，隐含运算于谜面，如猜者不察，则难得谜底。例如“千”字谜：

刘秀十二走南阳，

太公八十遇文王，

彭祖活了八百八，

二十八宿下天堂。（采录地区：温县）

谜面看似在说古人的典故，实则为有典化无典，隐含数字于其中。将谜面中的数字十二、八十、八百八、二十八加起来为“千”。

二、河南民间字谜的语言特色

民间谜语具有口头传播、外形描绘、语言风趣、浅显通俗的特点。谜面往往是山歌体的民谣，以四句形式出现较多，讲究押韵而有节奏，读之可以琅琅上口，有时夹有浓厚的地方方言，扣合只按其音取意并不苛求该字本义，一般谜面多有闲字，也不避讳谜底之字出现在谜面上面。这正是民间谜语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特点的典型表现。

从河南民间字谜的表现形式看，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歌谣式，多为一谜一底。由于继承了民歌传统，单句谜面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及七字以上单句，尤以五字句与七字句居多。整谜的句式有两句式、三句式、四句式、多句式样样皆有，尤以两句式、四句式居多，这些特点体现了民歌的特色。

（一）合辙押韵式

这类字谜的谜面采用五绝或七绝的格式，句式押韵，平仄相合。但由于对制谜者的要求较高，使得此种字谜的数量不多，多数为押韵不合辙，有的甚至不押韵。如“一”字谜：

項羽当初武艺精，

争天夺地却无功，

八千子弟都丧尽，

自刎乌江终落空。（选自任敦新《中华谜歌大观》）

整首谜押韵合律，是为数不多的标准型谜面。扣合上采用离损法，以“項”字为基础，先减去“工”（“无功”谐音“无工”），再相继损去“八”和“自”，得出谜底“一”。

（二）方言土语式

民间谜语以口头创作，口头咏猜，口耳相传为主。因此，谜面也保留了劳动人民的方言土语，正是这些地域性方言的语言特色、内容特色和形式特色，对研究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非常重要，它能够反映中原地区特色鲜明、意蕴深厚的农耕文化、女娲文化等。如流传于林州的“心”字谜：

小铛锅，炒豆呃，

蹦出俩，丢下 yuē 。（采录地区：林州）

“炒豆呃”，林州方言，即炒豆子。“yuē”，林州方言“一个”的连读音，属于有音无字。又如，流传于南阳的“姜”字谜：

王字头上长俩角，

女在下面圪蹴着。（采录地区：南阳）

圪蹴，南阳方言，蹲之意。这些方言的口语化、土语化、地域化特点，使猜谜者听之亲切，猜之动情，大大提高了猜谜的兴趣。

三、河南民间字谜传承的危机

由于相当部分的民间谜语所用的都是方言，方言有其不利于异地或大众化传播的局限性。再者，一些谜语中的方言语句，不为现代人所能理解。当代民间谜语的现状真是如此，正在走向衰退，急需扶植。

（一）传承环境功能的弱化

由于集体性的削弱，谜语口头传承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小，城市里社区教育伴随着社交活动的减少，其教育传承功能也逐渐弱化。口头传承原有的存在语境毕竟是在生活中、劳作中、仪式中，没有这些活动，单纯的口传未免缺乏了现实的土壤而难以进行下去。

（二）谜语文化精英的断层

从搜集整理民间谜语的资料来看，掌握民间谜语的主体力量几乎都在 40 岁以上，其实大部分都在 60 岁以上，但数量又不多。这些数据说明，民间谜语面临着传承力量的断裂，土生土长的民间谜语其实用价值和娱乐的吸引力正慢慢消失，因而出现谜语文化精英的断层现象。

（三）书面教育与传统口传的关系困境

现代的学校教育是书面教育，强调的是知性的知识传播。而口传教育是生活化的教育，建立在社群环境上，学生们会产生隔膜感。即使是对于那些没能进入城市，最终留在乡村田间的学生来说，学校教育已经不能使他们适应乡村日常生活和劳作，传统的口传教育受到偏离。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民间谜语未能给予关注，大量的民

间谜语依然散落在民间。2018 年起《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的搜集整理，推进了此前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忽视的谜语部分。我们要抓住机遇，深入河南大地寻踪觅迹，为子孙后代留下民俗学谜语方面较完整的资料。

民间字谜的排序与分类

刘二安[1]

民间字谜，是河南民间谜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流传的字谜数量较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一）》初稿编纂时，就汇集了近 1000 个单字、4000 多首民间字谜，经过筛选，最后编入初稿的还有 800 多个单字，2000 多首字谜。第二卷补充了大量新征集到的字谜，比初稿增加了 150 多个单字，共收录 980 多个单字；增加 1000 余首单字谜，共收录 3000 余首单字谜、170 多组 200 多首多字谜。

河南境内有仓颉造字、甲骨文字、《说文解字》等文字传统遗存及丰厚的历史积淀，南乐、鲁山——安阳——漯河，汉字在这方土地上创造、发展、成熟，在河南影响广泛而深远，这或许正是河南民间字谜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多的原因。明末清初，河南祥符（今开封）文学家周亮工（1612—1672）所著《字触》，从历代正史、野史、笔记、小说等古书中广泛采录拆字测字、廋词隐语的有关资料。该文献对于研究河南乃至全国的字谜也有重要的意义。

就在我们编纂字谜期间，恰好又发现了两件豫北地区字谜流传的实物，虽字迹斑驳，却见证了字谜在河南的悠久历史和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一是获嘉县古玩市场的一个老橱柜上，两面都绘有民间字谜，二是鹤壁市山城区传统村落肥泉村明清古民居墙上，题有一些民间谜语，其中有两首字谜。这四首字谜我们都已作为异文，收录到谜语卷中。

关于民间字谜的实物，邻省河北还有著名的武强灯方年画，刻制有部分字谜，磁州窑谜语罐，烧制有部分字谜，这些字谜，在河南各地也流传有多种异文，收在了《河南谜语卷》中。历史上行政区域犬牙相入，在金、明、清三个朝代，邯郸市现辖的武安、临漳、磁县、涉县，曾隶属彰德府（今安阳），彰德府辖区后来被河北、河南两省分治，两省的

[1] 刘二安，大系出版工程“谜语”专家组专家，《大系·谜语·河南卷》主编，河南省民协灯谜学委员会会长。

谜史资料有不同程度的交集，自然在情理之中。

由于字谜与物谜特点有所不同，我们在编纂时进行了认真的排序和分类。

河南省民间谜语艺术家任敦新先生所编著的《中华谜歌大观（字谜集）》，1990 年 2 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 3000 余首字谜，其中既有传统字谜，还有广泛搜集的字谜，按谜面字数编排为单字谜、多字谜，因字谜多为歌谣体，故名为“谜歌”，是当代搜集民间字谜最多的一本谜语集，其排序虽不太科学，但为谜语卷字谜的编纂提供了大量资料，功不可没。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民间谜语全集》（朱雨尊编，1935 年上海书局）的排序方法，是最适合参考的。该书分为物谜、字谜甲乙两大类，没有事谜，我们在编纂《河南谜语卷》的实践中也感觉到，事谜确实数量较少，许多事都是通过物来具体体现的，没有具体的物，就没有抽象的事的存在，事谜毋宁说是物谜的附属。该书虽然没有事谜，但彰显了字谜在谜语中的重要地位，也恰恰符合《河南谜语卷》编纂资料的实际状况，我们大可参考《民间谜语全集》的字谜排序方法。

《民间谜语全集》字谜的排序为，一级标题：（乙）字谜；二级标题：在一级标题“（乙）字谜”下，按谜底字数作二级标题，分为一字谜、二字谜、三字谜、四字谜；在二级标题下，再以笔画为序，依次分为一画、二画……作三级标题；谜底字按笔画顺序从少到多排列，只标序号，作为四级标题，同一字为谜底的在同一序号下接排，只是其排序似乎是随意的，没有一定的规律。参考这种排序方法，再遵照谜语卷编纂体例，我们制订了《河南谜语卷》的字谜排序方法。

按照编纂体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的编排，主要分为四级标题，例如：一级标题：物谜；二级标题：生产交通类；三级标题：交通（第一至三级标题按编纂体例顺序，部分类别如建筑类没有三级标题）；以谜底设为四级标题：桥；根据各类具体内容，同一谜底有异名或各地叫法不同、同一名称可再细分的，有必要的另增设五级标题，如：独木桥、桥、石孔桥、石桥（第四至五级标题按首字拼音为序，相同谜底的，按谜面首字拼音为序）。由于字谜的特殊性，字谜部分以笔画为序作三级标题，相同谜底的字谜则仍按谜面首字拼音为序。

具体到字谜的排序见下：

一级标题：三、字谜

二级标题：（一）单字谜；（二）多字谜

三级标题：（一）单字谜 1.一画、2.二画……

（二）多字谜 1.二字、2.三字、3.四字、4.五字及以上

四级标题：以谜底为四级标题，不标序号，以拼音为序，多字谜以首字拼音为序；相同谜底的多首字谜，按谜面首字拼音为序排列，首字相同的依次按下一字拼音为序。字体一律使用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因扣合需要的字谜，谜面、谜底均保留繁体字或异体字，为区别起见，字体加粗（供排版时选择字体使用）。个别谜底有简体、繁体（或异体）之分的，仍按简体字作为四级标题，之下增加五级标题。个别谜底只有繁体字而没有简体字的，则以此繁体字作为四级标题。

五级标题：依次为该字的简体、繁体（或异体），不标序号。

一至三级标题居中，四级标题左对齐，五级标题缩进 2 字符。

字谜的排序方法确定之后，还有一个字谜的确认，即如何分类的问题需要考虑。同样的一个字，仅从字形看，自然是字谜，但这一个字同时也是一件物，如果该谜描述的是这件物而不是这个字，自然又应该归入物谜。我们在单字谜的审稿过程中，就发现有一些属于物谜而被误编入字谜的，例如“人、羊、井”等的一些谜例，这样的舛误，在以往出版的谜语集中也时有出现。朱雨尊《民间谜语全集》的物谜建筑类“井”里，就收录有一条“一字生得恶，四面皆有角；一生不怕火，只怕是坍角。”虽有后两句对“井”作为建筑的补充描述，但此谜首先就明确了是一字，并用“四面皆有角”来描绘了“井”的字形。这样的单字谜底，我们认为应该归入字谜而不是物谜。

单字谜分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决，但多字谜就有些复杂了。我们在编辑多字谜时，就遇到多首主要是四字谜底的分类需要商榷的。例如：

風、花、雪、月

虫入鳳飞不见鳥，七人头上有青草，

有雨落到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

（采录地区：南阳）

繁体的“風、花、雪、月”均为拆字成谜，尽管其每句扣合一个字，谜底合起来连读是一句话，属于字谜的合并，列入“多字谜·四字”应无疑义。

风花雪月

起时波浪绿，开处鸟啼红，

天寒棉盖地，云净镜挂天。

（采录地区：项城）

简体的“风、花、雪、月”则纯为会意，它们所猜射的不是这几个字，而分别是自然现象、植物、天体，谜底是并列的，分属四件不同的物谜类别，但它还是一句成语，原指旧时诗文里经常描写的自然景物，后比喻堆砌词藻、内容贫乏空洞的诗文，也指爱情之事或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因此，既可将其归入物谜的第十类“综合类”，也可归入其他类的“词语·成语”，考虑到符合人们习惯的说法，我们最终将其归入了成语。

另一例，如：

忠、孝、節、義

利剑穿嘴扎心窝，十一儿练武把枪托，

即将军坐在竹林下，我王头上两个角。

（采录地区：商城）

与“風、花、雪、月”一样，亦纯用拆字，谜面每句扣合一个字，虽然四个字连读为一句话，仍归入多字谜。但另有简体的：

忠孝节义

岳飞大战在牛头山，王祥卧冰感动了天，

孟姜女哭的长城断，刘关张结拜在桃园。

（选自任敦新《中华谜歌大观》）

谜底纯用会意，不是扣合的这四个字，而是四种行为，这四种行为合起来是一句成语，出自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二十回：“民知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泛指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准则，是不应该归入字谜的。其他还有一些谜底是成语的，我们拟收

入在第三卷“其他类”的“词语·成语”中，例如：长命富贵、人寿年丰、同床异梦、喜怒哀乐、酒色财气、巧言令色等。

另有“黑、白、青、红”“黑、白、青、黄”，以往归入字谜，因不是扣合的四个字，而是并列的四种颜色，我们归入了物谜的第十类“综合类”。“赵钱孙李”扣合的是四个姓氏，是《百家姓》的一句，并不是这四个字，故我们拟将其归入第三卷“其他类”的“词语·姓氏”中。

以上的分类方法在以往是没有采用过的。《民间谜语全集》中：春夏秋冬、风花雪月、货真价实、福如东海、请坐奉茶、夫妻义重、金玉满堂等，收在字谜“四字谜”。《金华各属谜语》：夫妻义重、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二三四、好酒烂肉、酒色财气、请坐奉茶、当朝一品、赵钱孙李等，亦作为字谜。《中国谜语大全》中，字谜收有：赵钱孙李、黑白青黄、晶姦森淼、一二三四等。前两书是在推广简体字之前编印的，均为繁体字拆字，自然应收在多字谜，但这次编纂所采录的同样内容或不同内容的非拆字、纯会意的简体字谜语，我们没有收录在多字谜，而是分别收录在了其他类别中。

与物谜不同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前的许多传统的字谜是以繁体字流传的。此后，民间又出现大批简体字字谜，导致繁简混用。除了谜底本身为繁体字外，根据字形成谜扣合的，有些在谜面中也必须保留繁体字，这样的例子很多，50 年代之后出版的谜语书中有些就忽略了，例如《中国谜语大全》，尽管在书中对需要用繁体字才能扣合的作了注释，但也出现个别遗漏，例如：“瞧左，相右，见上，看下”，谜底为“目”，谜面中的“见”字，则必须为繁体“見”才行；另如“亚”字谜，也必须用“亞”，才能与谜面中的“中间若没肚肠，外面任生棱角”相吻合。

民间文学融入中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蔡浪 李跃忠[1]

我国民间文学丰富，就形式而言，散文类的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童

[1] 蔡浪，湖南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大系·小戏·湖南卷·影戏分卷》编辑。李跃忠，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大系·小戏·湖南卷》主编。

话、民间笑话等，韵文类的有民歌民谣、谚语、史诗、谜语等，韵散结合的有民间小戏，以及评书、弹词、渔鼓、快板等说唱；就其题材内容来说，虽有少量的朝代更迭、军事征战等重大题材，但更多的是表现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小素材，范围极广。

我国民间文学的作品浩瀚如烟，其思想主旨虽然良莠不齐，但绝大部分作品的思想主旨是积极健康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吻合的，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有益补充。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要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应使全体学生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人文修养，为终身学习和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民间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有意识的融入民间文学。关于民间文学对人之教育、教化的作用，我国先民有过不少这样的论述。以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戏曲为例，它在给民众传授文史常识、提高民众之艺术欣赏力、培养其乡土情怀，对他们进行传统道德、为人处世等社会规范教育方面，均有着较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元人胡祗遹认为“台官不如伶官”，高明也提出戏剧创作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看法。到了明清时期，这一点更为统治者和文人所关注，如朱元璋大力称颂高明的传奇《琵琶记》，而他看重的就是作品的教化作用。又，清初湖南湘潭文人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一文中也认为戏曲：“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也。噫！兴观群怨，尽在于斯。”近代以来，一些进步文人也注意到了戏剧在“开通民智”方面的作用，如1904年时，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推戏曲为“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

民间文学除了在主题思想方面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德育、美育等培养目标有相通之处外，也可将民间文学纳入语文课堂教学，以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具体而言，民间文学融入中学语文教学，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必修教材中适量增加不同类型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相较于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对中学生提高对虚构与现实的把握能力和对联想与想象的运用能力，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提高语言能力，都有着独特的作用。然而多年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强调学习文学经典，重心倾向于作家文学经典。“标准”之教育

目标第十项指出“通过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体会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理解、认同、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不少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发现这些作品明显的是以精英文学、作家文学为主，而民间文学作品明显偏少。以近些年通行的中学语文教材而言，教材中常见的民间文学作品仅有《诗经》中的民歌《关雎》《蒹葭》《氓》《静女》《无衣》，汉乐府民歌《长歌行》《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有限的篇目。不仅数量少，而且形式也单一，除几则神话外，其他的就是民歌，而这些民歌都已经流传了千年以上，已经经典化了，至于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则很难在语文教材中见到踪影。具体教学中，无论是民间文学的作品赏析，还是它的历史文化、审美特征等均很少被作为学习的重点。这一情形相较于我国民间文学之丰富的体裁、优秀作品的浩瀚数量，显然是不太合理的。因此，我们以为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应适当增加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要增加一些仍在“活态”传承的作品。而事实上，民间文学由于生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其与学生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因此，民间文学的教学更能使中学语文教学具有现实感和生活趣味。

二、语文课堂授课，适当引入民间文学形式。如教师授课时有意识地以民间文学的形式，如影戏、相声、木偶戏等讲授部分课文等；作文课时，通过介绍、观摩地方民间文学，让学生熟悉民间文学的体裁特征，而后鼓励学生进行简单的民间文学作品创作；师生合作以民间文学，如影戏、说唱等形式改编部分课文，在课上或课外进行表演等。民间文学，本是地方文化知识，是每一个当地人都应知晓甚至能传承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中学生大部分不了解家乡“活态”的民间文学，或者虽有了解，但亦不太深入，更不用说去传承了。因此，教学中若引入这些，其新颖的形式自然会对青少年产生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融入民间文学，也能使中学语文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为灵活，进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加强乡土教材、校本课程建设，将民间文学作为语文课程学习的重要补充资源。1999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

出，我国教育“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建设，均是重要的语文课程学习补充资源。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和课外学习资源，种类较多，蕴含较广。“标准”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就现行教材中的篇目而言，其容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要积极主动开发语文课程资源，有意识地利用好民间文学这一巨大宝库，建设一些包含民间文学的乡土教材和学校课程。比方选取一些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地方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说唱、民间小戏、史诗作品等，编纂成册推荐给学生作为课外读物；将一些简短的优秀地方民间文学作品，如民歌、寓言、童话等搬上课堂进行赏析。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校园活动，以丰富语文课程资源。我国民间文学体裁多，且多数有着很强的表演性，很适合于用来开展语文校园课外活动，如举行“家乡民间故事会”“民歌演唱”，组织“校园剧社”“校园曲艺社”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邀请民间文学艺术家进校园，依据语文课程内容需求，进行民间歌谣教唱、民间故事讲述、民俗展演等活动。此外，教师也可引导学生参与各类民间文化活动，如节假日期间，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感受地方民俗，搜集资料，撰写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有条件的还可将其制成专题片。通过这些活动，既能传承传播优秀民间文化，也能提高学生运用新媒体和计算机的能力；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能帮助学生全面展示自我，并增强学生的乡土情结、文化认同感等。

五、强化语文教师教授民间文学的意识。教师是教学的主体、组织者，因此语文教师的个人素养，与民间文学融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知道民间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创作、传播规律，对这些作品的赏析与解读也不完全同于精英文学、文人作品。如对民间歌谣作品的赏析与解读，应从以下一些角度入手：作品的主题与内容、作品的艺术技巧、作品的文化功能等。其中有些作品，比方仪式歌、情歌等的文化功能解读，还需要结合其演唱“场景”来分析。民间文学的这些特性要求语文教师必须具有民间文学教学意识，同时也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民间文学素养。就目前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民间文学教学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师在备课或者上课时都没有融入“民间文学”的意识，也忽略了

民间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其特有的审美特征。显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学生自然是无法领略民间文学的艺术魅力的。

“标准”指出“祖国语文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运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民间文学，不仅在内容、形式上能丰富语文教学，而且民间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部分，语文教学中自觉地融入民间文学，这自然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且这一教学行为对我国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蒙古史诗搜集整理概况及翻译问题

布和朝鲁　李润平[1]

蒙古族以丰富的英雄史诗传统而闻名于世，不仅拥有《江格尔》《格斯尔》这两部鸿篇巨制，还有 300 多篇中、短篇史诗。

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其史诗在内的许多民间文学作品，都具有鲜明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蒙古史诗或阿尔泰语系民族史诗的特点之一是人物形象和情节的模式化；另一个重要特征乃是“活态史诗”，人们至今能够在民间听到艺人以古老方式演唱英雄故事。

蒙古族把本民族的口传史诗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保存、供奉和传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国内外陆续发现的史诗《罕哈冉贵》和《江格尔》的一些古老抄本，便能说明这一点。《格斯尔可汗传》于 1716 年由佚名文人记录，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在北京刻版印刷，并以《北京版〈格斯尔〉》著称。

一、国内对蒙古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最初从学术角度搜集整理国内蒙古英雄史诗的是国外学者。我国本土学者对蒙古史诗的搜集工作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行的。

甘珠尔扎布搜集整理的《三岁的古纳罕乌兰巴特尔》《汗特古斯的儿子喜热图莫尔根

[1] 布和朝鲁，内蒙古民协主席。李润平，内蒙古民协干部。

汗》《扎嘎尔布尔图汗》等，收录于1956年出版的民间文学集《英雄古纳罕》，这是内蒙古出版的首部英雄史诗集。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道荣尕、高·扎木扬等学者编辑出版了《英雄史诗集》，又在他们编印的内部资料《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第三、四卷中收录了巴尔虎、扎鲁特、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的十多部史诗。在巴尔虎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方面，仁钦道尔吉、道荣尕两位学者成果颇丰。仁钦道尔吉出版了《希林嘎拉珠巴特尔》（1978）、《蒙古族英雄史诗集》（1978）、《蒙古民间故事集》（与道尼日布扎木苏、丁守璞合作，1979）、《那仁汗传》（1981）、《吉如嘎岱莫尔根》（与旦布尔加合作，1987）等书籍。在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搜集整理方面，道·乌兰夫、陶克涛胡、拉斯格玛等人做了大量工作，陶克涛胡、拉斯格玛二人于20世纪80年代在呼伦贝尔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中搜集英雄史诗，出版了《勇士布扎拉岱与卷鬃马》（1995）。在乌拉特史诗的搜集整理方面，乌拉特籍学者莫纳不遗余力，在《阿斯尔莫日根汗的故事》（1990）一书中收录了6篇乌拉特英雄史诗。尽管他出版的史诗作品具有明显的加工痕迹，但他挖掘乌拉特史诗遗产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扎鲁特—科尔沁史诗与传统蒙古英雄史诗有明显的差异，当地民众称其为“蟒古斯故事”，主要为民间说书艺人的作品，在内容、风格、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融入了许多胡仁乌力格尔（蒙古族说书）色彩，而缺乏传统史诗那种宏伟气质和凝练的语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民间艺人琶杰、毛依罕演唱过数篇此类史诗。道荣尕、尼玛、特古斯、却吉嘎瓦、桑布拉敖日布和德国学者海希西、法依特等人搜集整理扎鲁特—科尔沁史诗，先后出版了《英雄道喜巴拉图》（1982）、《阿斯尔查干海青》（1980）、《阿拉坦嘎拉布汗》（1988）、《宝迪嘎拉布汗》（1990）等史诗集。在青海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方面，乔苏荣、才仁巴力、才仁顿都布、才仁、乌云毕力格等当地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整理了《汗青格勒》《道利精海巴特尔》等著名史诗。内蒙古学者道荣尕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到柴达木搜集了几部《格斯尔》及数篇英雄史诗并发表。笔者也曾两次赴海西州搜集《格斯尔》史诗和相关风物传说。

在蒙古英雄史诗中，《江格尔》和《格斯尔》最具盛名，与《蒙古秘史》共同被誉为“蒙古古典文学的三大高峰”。在我国，《江格尔》主要流传于新疆地区，《格斯尔》主要流传于青海、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国内对这两部史诗的搜集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较晚，

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然后中断 10 多年，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得以继续。阿·太白、仁钦道尔吉、宝音贺喜格、托·巴德玛、格日勒玛、乌珠玛、旦布尔加甫、塔亚等学者先后发表了《江格尔》的 150 余种变体和《祖乐阿拉达尔汗》（1980）、《那仁汗传》（1981）、《卫拉特蒙古史诗选》（1987）等史诗集。

除在青海外，学者们还在内蒙古开展了《格斯尔》搜集工作。北京木刻版《格斯尔》曾广泛流传于内蒙古地区。据传，过去东部地区蒙古族胡尔奇（说书艺人）也演唱《格斯尔》和有关的《镇伏蟒古斯的故事》。1960 年，扎鲁特著名说书艺人琶杰将 1956 年内蒙古铅印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和《隆福寺格斯尔》的内容）全文，用四胡伴奏，以史诗形式演唱。以此次演唱为基础，诗人其木德道尔吉整理出版了《英雄格斯尔可汗》（1963）；80 年代，道荣尕、阿斯拉图二位学者又整理出版了 2 卷本的《琶杰演格斯尔》；巴·布和朝鲁于 2010 年将琶杰演唱的全部内容（约 60000 行）未加修改，以《英雄格斯尔》之名列为《格斯尔全书》第八卷出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索德那木拉布坦、道荣尕、格日乐图、新巴雅尔、斯钦孟和等学者记录并发表了乌兰察布市和赤峰市巴林右旗胡尔奇演唱的《格斯尔》，其中，由叁布拉诺力布演唱，索德那木拉布坦、格日乐图整理的《巴林格斯尔》，罗布桑演唱，龙梅、乌·托亚整理的《胡尔格斯尔》、道荣尕搜集整理的《巴林格斯尔传说》，金巴扎木苏演唱斯钦孟和整理的《圣主格斯尔可汗》等影响较大。

近年来，《格斯尔》《江格尔》的保护、传承、传播和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取得了重大成果。无论在内蒙古还是新疆，史诗传习所里老艺人在给年轻艺人传授史诗演唱技艺，各地相继出版了很多史诗文本和研究成果。

在内蒙古，既有人们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艺人演述，以当时的标准和方法搜集整理的文本，也有从七十年代末期至今，在采录条件、方法逐步改善，理论和标准方面逐趋提高的情况下搜集整理的文本；既有传统史诗艺人演唱的内容，也有新一代艺人演述的文本；既有按照记忆完成的文本，也有演述过程中即兴创作的情况。例如近 40 年搜集的《格斯尔》史诗，体量巨大，情节复杂，既有传统的史诗性表达，兼有即兴发挥。

2007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仁钦道尔吉、朝戈金主编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4

卷；在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组织实施的“内蒙古民间文化艺术长廊工程”中，内蒙古民协组织编纂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上、下），于 2017 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内蒙古民协启动的“内蒙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内蒙古史诗集成•苏尼特右旗卷》和 4 部《蟒古思故事》分别于 2008、2019 年由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内蒙古卷》的翻译问题

2020 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内蒙古卷》（以下简称《内蒙古史诗卷》）的编纂工作启动，内蒙古民协组织相关人员，按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结合内蒙古地区史诗的实际，针对搜集、编选、翻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制定了《内蒙古史诗卷》的编纂方案。

从史诗在内蒙古的发展情况来着，蒙古史诗在各民族史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也是《内蒙古史诗卷》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以推动优秀民间文学传承发展和知识普及为根本任务”，使优秀的民间文学、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更有力地弘扬，因此，做好对少数民族作品的翻译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在内蒙古，已搜集、出版的蒙古史诗虽然非常丰富，也为《内蒙古史诗卷》的编纂工作奠定了材料基础，但汉译的文本较少，个别的盟市、旗县卷有汉译版，这意味着《内蒙古史诗卷》的翻译工作会非常繁重而有难度，对翻译者也有更高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掌握翻译技巧，更要了解蒙古族的文化、思维方式，对史诗有基本的研究或理解。翻译工作中，要按照“尊重母语，科学注释”的要求“对不易理解的母语表述、方言土语、风俗习惯、地方知识等进行注释和说明”。对译文，编委会要组织专家进行严格把关、审订，对存在争议的地方地行集中讨论，力求严谨，使译文尽量保持口语特点，并充分体现原作的内涵，又要具有汉译本的可读性。

本着对祖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高度负责的态度，既要对口头史诗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又要讲求科学的方法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无论是在选择、整理作品还是在翻译的环节上，都要注意保护和保存文本类型的多重性、演述技艺的独特性、流传部落和区域的多样性以及文本产生的社会民俗环境等背景因素，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这一文化宝库奉献独具魅力的蒙古英雄史诗。

民间长诗论纲

向柏松[1]

中国各民族民间长诗丰富多彩，南北风格差异显著。北方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多有英雄题材，风格豪放、粗犷。如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嘎达梅林》，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藏族的《日月情》，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曼》，回族的《尕豆妹与马五哥》《紫花儿》（又名《吆骡子》），东乡族的《米拉尕黑》，赫哲族的《满斗莫日根》，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达斡尔族的《少郎和岱夫》、裕固族的《黄黛琛》等；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长诗多取历史现实生活故事，风格婉约、细腻。如彝族的《阿诗玛》《我的幺表妹》《妈妈的女儿》，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即《清水姑娘》）《金笛》，壮族的《马骨胡之歌》《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嘹歌》，布依族的《伍换林》，景颇族的《凯诺和凯刚》，哈尼族的《洛奇洛耶和扎斯扎依》《不愿出嫁的姑娘》，土家族的《金鸡》，侗族的《刘梅歌》，瑶族的《张氏女卖花记》，仫佬族的《白马姑娘》，毛南族的《枫蛾歌》，京族的《宋珍和陈菊花》等；汉族的民间长诗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风格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近。有江南吴歌中的民间长诗，如《白杨村山歌》《沈七歌》《五姑娘》《林氏女望郎》《薛六郎》《魏二郎》《孟姜女》《小青青》《刘二姐》《庄大姐》；有湖北咸宁市的民间叙事长诗，如《崇阳双合莲》《钟九闹漕》等；还有湖北宜昌市夷陵区的民间叙事长诗，如《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等。凡此种种，全豹一斑而已，但也足见中国各民族民间长诗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状况。各民族民间长诗在我国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民间长诗辨析

民间长诗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长诗是指人民大众创造的与短小精悍的歌谣相区别的所有的长篇诗歌的总和，包括：史诗（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民间叙事长诗、民间抒情长诗、民间知识长诗等。

狭义的民间长诗是指人民大众所创造的不同于史诗、歌谣的一种篇幅较长的诗歌。一般而言，在民间文学学科领域里所指民间长诗，是取狭义概念，这在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

[1] 向柏松，大系出版工程“长诗”专家组组长，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践中已成为约定俗成。因此可以说，民间长诗是与史诗、歌谣相并列的一种民间诗歌体裁。

民间长诗不同于歌谣，这是显而易见的：民间长诗篇幅较长，少则百行（以百行为底线），多则数千行，上万行，甚至数万行。民间歌谣则是短小精悍的抒情篇章，少则两行，如信天游。一般为几行，如四句子、五句子。稍长一点的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也只有十来行或数十行。

民间长诗中的民间叙事长诗与史诗虽然都具有叙事、刻画人物、采用韵文形式等共同之处或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史诗发端于原始社会晚期和国家形成时期，是在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大型口头创作，主要讲述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以及文化的发明、民族迁徙、朝代更迭的故事，或讲述民族、国家形成时期部落首领英雄故事。如苗族的《苗族古歌》，彝族的《查姆》《梅葛》，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汉族的《黑暗传》等。史诗可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世史诗主要产生在南方，英雄史诗主要产生在北方，但也有例外，如苗族的《亚鲁王》，就兼有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的品格。民间叙事长诗主要讲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历史故事、现实生活故事，特别是明清及其以后的社会生活故事。据此，考察湖北夷陵、神龙架等地区的长诗《黑暗传》《盘古歌》，可见其主要内容是创世史诗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文化发明等母题与三皇五帝谱系神话的糅合，其性质应属史诗类别，所以此次湖北编纂民间长诗卷，将《黑暗传》的各种异文以及相类似的长诗从民间长诗中选出专列一辑，名曰神话长歌，比较合理。

民间长诗有各种分类，众说纷纭。根据其表现方法来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民间叙事长诗，主要采用叙事方法，叙述一个事件的循序渐进的完整的时间进程，并辅之于抒情；民间抒情长诗，以抒情为主，抒发内心喜怒哀乐感情，并辅之于叙事；民间知识长诗，以说明方法为主，介绍地方性知识，时有辅之于叙事以为例释。

中国各民族民间长诗的演唱主要是在人生礼俗如诞生礼、婚礼、葬礼以及民族节日、民族庆典等文化空间进行。随着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空间的逐渐逝去，民间长诗也逐渐失去了其生存土壤，陷入濒危状况。此次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可以在收录保存中国民间长诗、缓解其濒危趋势的基础上，激活传承人代际延续机制，促进其活态传承。

二、民间叙事长诗

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叙事作品；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也有少量第一人称叙事，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画，也称“故事歌”或“故事诗”。民间叙事长诗是民间长诗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其内容与形式稍多分析。

1.主要内容及他

民间叙事长诗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反抗斗争，描写爱情悲剧。

其一，歌颂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和邪恶势力的反抗斗争。近现代社会，由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广泛。虽然这些反抗斗争多以失败告终，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及事迹却得以广为传颂，以叙事抒情见长的民间叙事诗便成为传颂这些英雄人物及事迹的重要载体之一。

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反映了以嘎达梅林为首的蒙古族人民反抗军阀张作霖勾结日本侵略者侵吞内蒙地区的斗争经历。据说在嘎达梅林起义作战之时，草原上已经开始流传歌颂嘎达梅林英雄事迹的短歌；在他牺牲之后，这些短歌被连缀成长达两千余行的叙事歌，到处传唱，以表达草原人民对他的深切怀恋之情。连缀起来的长歌，差不多叙述了嘎达梅林起义的全过程。至今，长歌深情、高亢、激越的旋律仍回荡在辽阔的草原。

汉族的《钟九闹漕》，反映了清末湖北崇阳农民反抗粮房敲诈勒索，聚众起义的历史事件。崇阳县粮房收“国课”时巧取豪夺，农民不堪重荷，在钟人杰等人的率领下，先是到县衙门告状，不果，便围攻粮房，遭到官府的残酷镇压。“官逼民反只得反”，钟人杰率众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攻占县府，杀了县官，树起了造反大旗。起义军接着又攻打蒲圻、通山和通城。清廷震惊，派重兵镇压，起义失败，钟人杰惨遭杀害。长诗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展示了官逼民反的历史规律，热情地赞颂了这次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

其二，民间叙事长诗中最多的篇章是以歌颂青年男女追求真挚的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迫害、争取婚姻自主为主题的。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男女自由择偶、争取幸福的婚姻，本来是自然而合理的人类本性。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婚姻一开始就被套上了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枷锁，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宗族婚姻、封建门阀观念、封建伦理观念等，成为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极大障碍，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逃婚、抗婚、殉情的事情经常发生。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令人辛酸、哀伤的悲剧，这些悲剧最为人们关切注目，最能牵动人们的情感，因此成为民间叙事长诗最主要的抒写对象。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多属此类。

傣族的《娥并与桑洛》叙述了一个近似汉族梁祝悲剧的故事。桑洛出身富商之家，聪明能干，为了逃避包办婚姻，桑洛外出经商。在古老的猛根城遇上了美丽的姑娘娥并。两人一见面，就感受到了爱情的强烈震撼。“像金色的藤，攀在一棵树上，扭得比丝线还紧。”但是，桑洛的母亲嫌娥并家庭贫寒，反对这门婚事。已有身孕的娥并远道赶来寻找桑洛，桑洛的母亲借故支开儿子，用毒计将娥并赶走。娥并在森林里生下孩子，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娥并回到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闻讯赶来的桑洛只看到娥并的最后一次微笑。他自己也抽出长刀，自刎倒在娥并身边。其情其景，令人胆寒。长诗歌颂了桑洛为追求纯洁的爱情而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藩篱的斗争精神，强烈谴责了以桑洛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美好爱情的残酷迫害，并用幻想的形式寄托了对男女主人公灵魂的美好祝愿：两人的坟头上长出了根根相连的芦苇，芦苇被桑洛母亲烧毁后，两颗星从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升腾而起。一晨一昏照耀人间，年年三月三，两颗星星便在天上相会，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更突出地揭露了封建恶势力的凶残与野蛮。当阿诗玛严辞拒绝了媒人的说亲时，热布巴拉竟倚仗权势，强行抢走了阿诗玛。钱财利诱、严刑威逼，都不能改变阿诗玛誓死不从的决心。“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九十九个不嫁！”这一坚强不屈的女性，在撒尼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美好的印象，她被恶势力害死后，化成了回荡在崇山峻岭的回声，“日灭我不灭，云散我不歇，我的声音永不灭！”

回族的《尕豆妹与马五哥》、裕固族的《黄黛琛》、汉族的《崇阳双合莲》等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优秀篇章。当然也有极少部分民间叙事长诗是以喜剧结束的。

除上述两大主题之外，我国各民族叙事长诗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采自传奇小说、曲艺戏剧内容的民间叙事长诗，不少出自《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

列国志》《水浒》等小说和《孟姜女》《白蛇传》等戏剧。表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民间叙事长诗，或褒或贬，多以歌颂惩恶扬善、公正执法、扶贫济弱为主要内容。还有表现儒家孝道思想的民间叙事长诗，其中有一些涉及二十四孝故事。此外还有涉及鬼神迷信、佛道故事的民间叙事长诗，多为宣扬善恶报应思想。可见民间叙事长诗十分贴近人们日常生活，内容十分丰富。

2.叙述曲折故事，抒发浓烈情感

民间叙事长诗多以歌唱形式流传，叙述曲折悲欢离合的故事，必带上歌者喜怒哀乐的情感，这就形成了叙事长诗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特点。民间叙事长诗大都要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故事情节多以主人公的曲折经历为线索单线递进发展，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具有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如《召树屯》叙述王子召树屯与孔雀仙女南诺娜的爱情纠葛，先叙两人一见钟情排除阻挠结为夫妻，接着写召树屯忍痛告别南诺娜出征，南诺娜受迫害飞走，召树屯历尽险阻终于找到南诺娜，携妻返国成为贤明的君主。情节扑朔迷离、起伏跌宕，故事性极强。

民间叙事长诗注重叙述故事，又绝不是像一部分叙事文学作品那样只作冷静客观的叙述，而是在叙述中融入歌者浓烈的情感。随着故事中悲欢离合情节的展开，自然流露出歌者的喜怒哀乐。民间叙事长诗的叙事语言、结构安排、表现方法等，都体现了这种叙事抒情相融合的特征。

3.塑造人物形象，多用诗歌表现方法

民间叙事长诗最引人注目和最具魅力之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那些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民众美好理想追求的诗意般的人物形象。如嘎达梅林、阿诗玛、黄黛琛、召树屯、仰阿莎、娥并、桑洛等，都是具有永久魅力的人物形象。

民间叙事长诗注重用诗歌的表现方法，如比喻、夸张、衬托、象征、双关等，塑造优美动人的具有诗意的人物形象。

4.民间叙事长诗的分类。据体裁来分，民间叙事长诗又可以分为诗歌体和戏剧体。诗歌体即以歌者的身份演唱故事的民间叙事长诗，如前所述；戏剧体属于代言体，即是以故事中的角色身份演唱故事的民间叙事长诗，或是以故事中的主人对话的方式演唱的故事长

诗。傈僳民间叙事长诗《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都是民间戏剧长诗，其内容都是由诗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演唱而构成（民间戏剧长诗分类及例释采自陈连山教授之说）。《生产调》主要流传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碧江、福贡、贡山等傈僳族地区。诗歌通过生产季节小伙子帮助姑娘劳动的过程，歌唱了两人由相爱、结合到生子过程中的美好情感。但是，他们的结合却遭到父母和家族的重重阻拦。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终于“结成对来盘庄稼”。诗中所唱的找地、开荒、播种、收穫，实际上暗喻着男女之间爱情形成的过程，结构双关，颇具艺术魅力。这首诗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傈僳族“刀耕火种”的社会生活，也揭示了劳动创造美好人生的真谛。《逃婚调》主要流传在云南西北部傈僳族地区。傈僳族历史上早期婚姻比较自由，后逐步实现包办婚姻。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经常遭到傈僳族青年男女的反抗，逃婚成为一种风气，《逃婚调》正是逃婚者所唱的歌。大意是：一对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但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包办定下了各自的婚姻。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追求美好的爱情，他们相约逃到远方。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定居大理。后来，他们又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得到家人和乡亲的理解。长诗生动细致地表现了这一对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复杂感情。语言质朴，近似口语。《重逢调》是一对恋人久别重逢互诉离别后悲惨遭遇的歌。女的以五头黄牛的身价被卖，从此过上了黄牛一样劳累的生活，男的以五块银圆的身价被卖，沦为奴隶。更为可悲的是，旧情人十年之后的重逢竟是新的离别的开始，因为女方已经被迫出嫁，并育有儿女。该诗叙事抒情凄凉悲切，催人泪下。

5.民间叙事长诗形成演变历程

我国各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至晚近才臻于完善兴盛，其中，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尤为丰富多彩。

产生于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已有叙事诗的萌芽。《谷风》《静女》《氓》等都带有明显故事性。

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一些小叙事诗，如《孤儿行》《病妇行》《陌上桑》《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叙事成分大量增加。其中《陌上桑》诗用侧面描写烘托罗敷美貌的表现方法，成为后世人物描写的经典范例。

直到汉乐府中出现了《焦仲卿妻》这样的作品，我国古代叙事诗才趋于成熟。该诗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反抗封建礼教、为爱而殉情的悲剧故事。故事曲折完整，哀婉动人，人物形象刻画细腻，篇幅较长，达 1700 多字，堪称我国古代民间叙事长诗的一部精品。北朝又出现了另一部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木兰辞》，以优美的诗篇歌颂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英雄事迹。叙事简洁生动，剪裁合度，风格雄浑刚劲。虽经过文人润色加工，却仍保留了民歌的基本特色。《焦仲卿妻》《木兰辞》可谓我国古代民间叙事长诗中璀璨耀眼的“双子星座”。

明清之际，我国民间叙事长诗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反映当时生活的叙事长诗。《钟九闹漕》，叙述清末农民起义的斗争故事；《崇阳双合莲》，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两首长诗都产生在清末。20 世纪 80 年代，在江浙一带吴歌中，又发现不少长篇民间叙事诗，这些诗大都产生于清中叶以后。如《沈七哥》《小青青》等。在我国民间叙事长诗中，少数民族的叙事长诗以其浓郁的民族色彩、丰富多彩的内容与艺术样式而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少数民族素有浓厚的民间诗歌传统，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歌手。民族神话传说、民族历史、生活习俗、重大事件等，往往都靠唱歌诵咏的形式而得以代代相传，这是少数民族长篇叙事诗得以繁荣发达的文化背景。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过搜集整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得以问世，为我国民间文学宝库增添了亮丽的光彩。

三、民间抒情长诗

民间抒情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抒情为主的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往往采用第一人称歌唱，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也比较灵活。一部分民间抒情长诗主要抒发世俗生活中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情感，还有一部分是民间婚丧、生产习俗、宗教活动中的情感抒发，是民间礼仪活动的组成部分（民间抒情长诗分类主要依据段宝林教授之说）。

民间抒情长诗是在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谣是民歌中的抒情短章，当情感的抒发更强烈、延续时间更长之时，就将歌谣连缀起来成为抒情长诗，篇幅达数百行乃至千行以上。民间抒情长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以抒情为主，没有故事情节，只

有中心事件。片段叙述描写是为了抒情。其二，一般采用第一人称，抒发情感。其三，一般结构较为松散。民间抒情长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生活抒情长诗，一类为礼仪习俗抒情长诗。

1.生活抒情长诗

生活抒情长诗主要抒发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之情，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邪恶势力的诅咒和痛恨。其中反映青年男女对自由美好爱情的追求、抒发由爱情悲剧导致的撕心裂肺的哀伤情感和对爱人的苦苦思念的抒情长诗占大多数。如彝族的《我的幺表妹》、傈僳族的《重逢调》、壮族的《唱离乱》（嘹歌之五）、布依族《月亮歌》、黎族的《十二月歌》等。

彝族的《我的幺表妹》可以说是民间抒情长诗中的经典之作。长诗通过男主人公的回忆，用激情洋溢的诗歌语言，抒发了对美丽、善良、忠贞而命运坎坷的幺表妹的爱慕思念之情，倾诉了由爱情悲剧所导致的悲痛和愤怒的情感，表现了对美好爱情的强烈追求和对奴隶制度下的买卖婚姻的血泪控诉。

壮族的抒情长歌《嘹歌》长达一万六千多行，从头至尾采用男女一问一答的形式。嘹歌产生于歌圩。壮族地区素有闹歌圩的习俗，然而，一般歌圩所唱的歌，都是即兴创作，随意性比较大。嘹歌则不同，是“岩仰歌圩”所唱的歌，有歌书为依据。岩仰是广西田东县思林乡的一个岩洞。据说古代这一地区战乱频仍，周边的百姓来到岩洞躲避兵匪，战乱平定后，人们便来到这里打太平醮，闹歌圩。嘹歌就是在岩仰歌圩所唱的歌。岩仰歌圩所唱的歌全套 7 篇：《三月歌》《日歌》《夜歌》《入寨歌》《离乱歌》《建房歌》《散歌》。由于人们唱歌时常用嘹嘹作尾音，所以称为嘹歌。《唱离乱》是嘹歌中的一篇。长诗以壮族土司征调平民去攻打起义的八寨瑶民为时代背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战乱中的悲欢离合的经历，对封建领主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发出了血泪控诉，表现出对土司统治者的愤怒反抗。最后，男的经过九死一生，侥幸生还，最终和心上人结为夫妻。

布依族的《月亮歌》抒发的是一位少女从思念情人到与情人相会这一过程中悲伤与欢乐的情感。她当初与情人以“金竹为凭”，倾心相爱，但因没有经过媒人讨八字而遭到反对。情人被迫远离而去，她的情感备受折磨，所以在月光下尽情吐露。最终，情人归来，

少女苦苦的相思与忧虑变成幸福与欢乐。长诗抒发了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中复杂缠绵的情感，深受布依族青年男女的喜爱，是他们月下谈情说爱时经常唱的歌。

在民间抒情长诗中，除了表现爱情的一大类外，还有抒发日常生活中各种悲伤与欢乐的歌。如壮族的《特华之歌》就是抒发一位流浪孤儿外出做苦工时饱受饥饿与凌辱的悲伤情感的歌。在壮族曾经有一种歌者请人代写诉苦的“歌书”的习俗，通过歌书的流传来发泄自己哀伤的情感，向世人告白自己悲惨的人生。《特华之歌》就是特华请人代写的寄回家乡的歌书。

黎族的《十二月歌》则是欢乐之歌。抒发了一年之中人们在劳作和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生活的乐趣。该诗分上下两节。上节从正月唱起，人们买钩刀砍园开荒种地，一直唱到十二月，人们喜气洋洋迎接新年。下节同样从一月唱到十二月，多表现田间管理方面的劳作和经验。长诗讴歌了劳动，抒发了劳动与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欢乐之情。

2.礼仪习俗抒情长诗

礼仪习俗抒情长诗是指民间婚丧嫁娶及生产礼仪习俗中的抒情长诗。民间婚丧嫁娶礼仪习俗行为常常有歌谣相伴。如婚礼中有撒帐歌，建房中有上梁歌，薅草时有薅草锣鼓歌等。当这些相对独立的短歌连缀成长篇诗歌，并融入歌者深厚的情感时，便发展成为民间抒情长诗。如汉族、土家族的《哭嫁歌》《薅草锣鼓歌》，彝族的《妈妈的女儿》等。

《哭嫁歌》是女子出嫁时唱的以歌哭为特征的系列组歌，曾经在南方地区广为流行。其中广东东莞的哭嫁歌、上海郊区的哭嫁歌、鄂西土家族的哭嫁歌等都受到了学者们的深切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深入。这里以土家哭嫁歌为例来加以说明。土家族的哭嫁歌包括哭开声、哭爹娘、哭木匠、哭石匠、哭哥嫂、哭十姊妹、哭众亲友、哭骂媒人、哭入席、哭梳妆、哭祖宗、哭穿衣、哭上轿等。其中，哭十姊妹比较独特。清人彭谭秋竹枝词《十姊妹歌》描写过哭十姊妹：“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山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土家族的哭嫁一般要哭 7 到 12 天，有的甚至长达一两个月。而且，在土家族，十二三岁的少女便已经开始跟随成年妇女咿咿哇哇学哭嫁，出嫁时便已经能歌善哭了。过去，人们往往以女子哭嫁的情况来评判她作为新媳妇的优劣。出嫁时只哭不唱，只唱不哭，或是哭得不伤心，唱得不感人，就会被认为是才德低劣。相反，女子哭得愈悲伤，

就愈是被认为贤惠能干。总之，出嫁唱哭嫁歌成了考验新媳妇的一道仪式，具有了成年礼的意义。土家族哭嫁歌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它伴随着女子的成年礼仪，发挥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彝族《妈妈的女儿》也属哭嫁歌类型。

四、民间知识长诗

民间知识长诗是以说明解释地方性知识为内容的长诗，包括说明解释生活哲理、道德戒律、地方特产、地名、家族谱系等内容的长篇诗歌。如壮族《欢传扬》为哲理性长诗。苗族的“议榔词”、侗族的“约法款词”为道德戒律类长诗。如川江号子可算地名长诗，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内容，而且将沿江的明礁、暗堡、险滩、水经流速等编进歌词，随时提醒纤夫，保证了行船安全。地方知识长诗涉及知识面广，曾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因而贮存了丰富的民众历史生活记忆，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民间长诗的研究

民间长诗的研究，主要是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我国民间叙事长诗最早的研究应该是关于乐府长诗《焦仲卿妻》和《木兰辞》的研究，但最初的研究并无独立的文体意识。真正把叙事长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文学体裁来进行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50年代关于《阿诗玛》等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评说。应当说，叙事长诗的研究与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研究相比较，是起步较晚和较薄弱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才逐渐多了起来。

关于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及其他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研究：1953 年 5 月，云南人民文艺工作团到彝族撒尼人聚居的路南县圭山区搜集《阿诗玛》长诗，共搜集到异文 20 份，其中一份为彝文写成。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据 20 份异文进行综合整理，于当年发表了整理本《阿诗玛》。此后，又相继于 1960 年、1979 年进行了重新整理，先后出版了两次重整本。《阿诗玛》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多家报刊、出版社相继刊行，还先后被译成俄、英、日、法、世界语等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阿诗玛》能够从云南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搜集、整理、研究者的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对《阿诗玛》的研究，从整理异文时就开始了。整理者将 20

份异文进行比较鉴别，确定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且以彝族的历史、政治、风俗、宗教、生活及有关的其他民间文化作为整理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是一种精细的考辨研究，奠定了《阿诗玛》研究的坚实的基础。较早的研究《阿诗玛》的论文有孙剑冰的《<阿诗玛>试论》、李广田的《<阿诗玛>序》等，这些论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对民间文学的整理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世纪 50 年代末，傣族的民间叙事长诗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西双版纳调查队发表《傣族古代的几部长篇叙事诗》，分别分析了《召树屯》《玉喃苗》(《猫姑娘》)、《香萌》《兰嘎西贺》的思想内容、艺术形象、艺术风格等。王松的专著《傣族诗歌发展初探》的有关章节，对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繁荣发达的原因、发展历程、主要作品及其成就作了专门论述。几十年来，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人们对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民族特色、艺术风格、历史价值，以及与作家文学、民族历史文化、外域历史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视野开阔、角度多样，对于拓宽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思路，具有启迪作用。

关于汉族民间叙事长诗吴歌的研究，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江南吴语地区长篇叙事吴歌的大量发现，吴歌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这标志着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民间叙事长诗研究领域里形成了共同繁荣的局面。天鹰《长篇吴歌的形成及其他》论述了长篇吴歌繁荣的时期及原因、形成的过程以及与时调、戏曲的关系等，考辨细密，资料翔实，令人信服。此外，几次大的长篇吴歌学术讨论会促使学者们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就长篇吴歌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民间长诗分类研究方面，段宝林、陈连山等都有新的成果，值得参考。

不论是在汉族，还是在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园地中，都流传着大量的民间长诗（俗称唱本）有待发掘整理和研究。湖北省民协于 1986 年编印过一册《湖北省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所收录的作品就达到 160 部。20 世纪末至本世纪，湖北咸宁与宜昌夷陵区又发掘整理出大量民间叙事长诗，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已申报列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分为湖北咸宁卷和湖北夷陵卷，即将面世，乘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东风，相信中国民间长诗的传承、搜集、研究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共享

王素珍[1]

一、重识民间文学

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民间文学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文献，保存了古老而丰富的民间文学，有的至今依然存活在民间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灰姑娘故事”最早的记录是我国唐代《酉阳杂俎》，至今仍以相当变化的形式，流传在我国广西、广东等汉、壮民族间。民间文学风格独特，大都真挚、直接、自然，不装腔作势、不争妍斗巧。沙尔·费勒克说过，民俗的歌谣……是抒发人们的感情、思想、风俗之天籁的、自然的、不具作者姓名的诗。

民间文学是文学，是艺术，同时也是生活本身。中国民俗学的泰斗钟敬文先生不止一次谈及关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他说，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民俗中，就像鱼儿生活在水里。民间文学，是抒发人民的感情、思想、风俗等的自然的作品，是反映民众生活与环境的一面的镜子。民间文学有真实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传统的艺术教养和表现方式，是长期以来民众参与吟味雕琢而成。他们的歌唱，他们的戏剧，他们的谚语，抒发着他们的欲求，凝聚着他们的经验，吟诉着他们的哀乐，描述着环绕他们的一切人为的制度和自然的景象。加里宁认为，“人民好像是掘金者一样，在数百年内加以琢磨，他选出、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只有最宝贵的、有才能的东西。”

钟敬文先生曾说，“中国的口头文艺，是中国传承文化的海洋中，乃至世界传承文化的海洋中的珍宝岛。”中国民间文学博大精深、丰富多样，《诗经》《山海经》《风俗通义》等典籍中不仅记录和整理了我国古代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保存了关于民间文学的理性认识和学术思考。世代相传的民间文艺百花园里，有古老的神话、壮丽的史诗、动人的传说、美丽的故事、悦耳的歌谣、优美的长诗、瑰丽的说唱、智慧的语言……也因为此，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

二、民间文学对心灵的滋养

关于民间文艺的记录、搜集和探究，古已有之。许多人都说，文学家是民间文学的保

[1] 王素珍，中国文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副编审。

存者，这话大略是不错的。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依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正像这些伟大的作家一样，海涅在儿童时代就受到丰富的人民口头创作的哺育。他曾感动地叙述幼年从奶娘那里听唱民歌和讲童话的情形：她能讲可怕的妖魔传，对童话以及民间的歌谣，她都有着丰富的肚藏。高尔基甚至说，没有民间文学知识的作家不是好的作家。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重要养料，更是民众教养的重要力量。钟敬文先生在《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中指出，一般民众，从摇篮时代起至坟墓时候止，差不多都沐浴在民间文学的海洋里。它给他们教导，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扶持，给他们快乐和希望。它不仅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一位智识上、行动上多方面的教师、朋友和爱人。他在《民间文学与民众教育》一文也谈到：民间文学，在今天我们的眼里看来，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但是，在人类的初期或现在的文化国里的下层民众（后者例如我国的大部分的农民），它是他们立身处世一切行为所取则的经典。民间文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社会的、伦理的、美学的等作用。民间文学，是培养民众道德和知识的不竭源泉。

在民间，民众不仅重视民族的文学、艺术的教养，同时重视民间文学对少年儿童的养育。民间文学能够给予他们艺术的熏陶，高尚道德的培养，陶冶高尚的品质，唤起他们爱乡土、爱祖国的情操和民族自豪感。歌谣可以滋养民众的心灵，使他们对人生、事物产生兴趣和理解；传说可以给予知识，而且注入道德教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采石补天、神农尝百草……这些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表现出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勇于担当的豪迈气概、不屈不饶的执着信念，不仅教养着我们的灵魂，而且为我们认识、理解、探索世界提供了一把把智慧的钥匙。

三、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共享

民间文学是人民生活所不能缺少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备的科学知识，了解、熟悉、掌握并正确地认识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任务。编纂民间文学经典读本以及各类教本、教材，是进行广泛的民间文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方式。

在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严格意义上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一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研究者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普及上做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

丰硕成就。民间文学的教学和推广，需要有专业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等高校教材较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民间文学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阐述了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这些专业教材成为广泛流通的学术读物，满足了高校师生学习民间文学专业知识和理论的基本需求。

过去民间没有专门进行教育的学校，但民众是有自己的教育的。他们除去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子女外，创造了多种民间文学样式，如谜语、儿歌、故事、传说等来教育他们。现代社会，少年儿童的教育更多转移到学校来进行，也正因如此，民间文学的普及教育，特别是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民间文学教材的编纂显得尤为重要、尤其紧迫。高等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民间文学教材的编纂与普及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从国家意义层面来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中华民族对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探索、争鸣和反思后的选择，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意义。《大系》来自民间，属于人民，《大系》教材的编纂和普及就是更好地传承与共享民间文学，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固本强基。

其次，《大系》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谜语、民间俗语以及民间文学理论 12 个门类与系列编选，计划出版 1000 卷，每卷 100 万字，基本囊括了民间文学的全部内容。同时，组建了 12 个门类的专家组以及学术委员会，凝聚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工作者和爱好者，代表了民间文学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我们编纂《大系》教材普及读本，是根据教育部新课程标准，在学生学习语文专业知识时，普遍接触民间文学的知识和理论。

民间文学丰富多样的体裁、题材，可以帮助少年儿童快乐健康成长。有许多儿歌，包括绕口令、数字歌等，可以训练儿童掌握语言、熟悉计数。谜语，对儿童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智力和想象力都非常有效。各种节日歌、礼俗歌、仪式歌，是儿童和少年人生历程中特殊时刻的重要陪伴。这些是滋养他们生活和成长的重要养分，也是基础教育、素质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的利器。《大系》教材普及读本，不仅注重民间文学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同时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经验技能的习得。

《大系》普及与推广同时包括干部普及读本、对外交流读本的编纂与发行。这些读本将作为《大系》普及示范图书，进入学校、图书馆及公共服务平台，在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同时，也将为对外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重要的平台。

民间文学是普通劳动者世代生存经验、生活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与推广《大系》，传承和共享民间文学，迫在当下，利在千秋。

中国北方民歌那达慕草原搭台

2017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于 2018 年正式实施，大系出版工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首批十五个重大工程之一，由中宣部统筹部署，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中国民协具体实施，主要包括《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大型文库编纂出版、大系出版工程基础资料数据库建设和社会宣传推广系列活动三个方面，是中国民间文学遗产抢救保护的民心工程、是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基础工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精神的贯彻和落实，旨在践行新时代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自大系出版工程实施以来，社会宣传推广活动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先后举办了“中国首届全国民间情歌大会”“中国壮语歌谣会”“中国江南民间小戏交流大会”“中国北方民间说唱交流大会”“中国·吕家河民歌会”等系列活动，积极探索有效途径，接续文化记忆链条，传承民族文化基因，保护文化生态及民族民间文化多样性，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发掘、传播、保护，形成全社会热爱民间文学的热潮，形成德在民间、艺在民间、文在民间的共识，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群众基础。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工作，8 月 26 日至 30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举办“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

2020·中国北方民歌那达慕暨北方民歌生态保护与传习座谈会”。此次活动由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协、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民协民间音乐艺术专业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民协、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呼伦贝尔市文联、中共陈巴尔虎旗委员会、陈巴尔虎旗人民政府、中共陈巴尔虎旗委宣传部、陈巴尔虎旗文联等单位联合承办。在有关省区市民协推荐民间歌手名单的基础上，经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大系出版工程“民间歌谣”专家组共同审议，确定了来自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吉林等 11 省市地区 66 位民间歌手参与活动。中国民协分党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冀晓青，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呼伦贝尔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韩国华，呼伦贝尔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姚广，陈巴尔虎旗旗委书记赵达夫等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并与当地群众一起观看了开幕式。

周燕屏在致辞中表示，在中宣部、中国文联的指示和领导下，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将进一步着眼于社会发展、生活需要，开展一系列以中国民间文学为主题的社会活动，积极探索有效途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多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各方面。同时，她希望通过举办同类的活动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民歌爱好者关注和珍视民间文化，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

民歌的魅力是无穷的，民歌生动地反映了地域社会的风土人情，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与现实性，是各民族文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7 日下午在“北方民歌生态保护与传习座谈会”上，王锦强讲述了民歌生存发展的三个关键词“人民基础”“语言生态”“原汁原味”，强调要把民歌放在文化空间当中展示，“民歌”与“生活的土地”相互依存，民歌的传承人、民歌的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这也正是大系出版工程实践以来，不断尝试与人民如何更亲近，夯实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体现。

“艺术创作需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吸取养分”“民间歌手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脱离

了生活的民歌，没有生命力和灵魂”“理解民歌，首先要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生活环境及其生活状态”“民歌是所有文艺形式的母体，民歌是金山银山，是地域文化的宝贵财富”“民歌传承人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民歌责无旁贷”“方言、民族语言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如果不加以保护传承，民歌将成无根之木”“声音只是工具、技巧，没有温度，方言才是灵魂、生命力”“民歌让我们小山村的百姓走上了更高的舞台，越发感到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与担当”“民歌应该与现代传媒同频共振，增加像今天这样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机会”……会上大家齐聚一堂，畅所欲言，讨论热烈、歌声不绝，民歌手积极的发声使得整场会议达到了高潮，这对于保护与传承民歌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此次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首次将民歌放置在整个文化生态保护良好的区域和空间展示，以草原为舞台，牛群、羊群、骏马、蒙古包为背景，创造性地搭建融生活情景式展演场所，还原草原农牧民生活场景，再现百姓生产生活的智慧与经验，展现民间文化的真实表达。现场民歌手以歌代言、热烈互动，充分调动了民歌手的参与热情。全程采取线上直播、云视频等多媒体传播手段，在央视文明密码新媒体节目《文明印记》快手直播平台播出，27 日直播超 40 万人次观看，同时在线超 4800 人次，后期在央视还会以民歌纪录片采风的形式播出。此外，本次活动对民歌手的口述采录成果，将编辑出版《风从草原来——民歌手口述实录》图书，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对焦和覆盖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开辟民间文化的大视野、大格局。（张慧霖）

“千年古县·干宝遗风”学术研讨会再征文

为了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

深入开展实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按照中宣部、中国文联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创作引导，深度探索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研究新时代民间文学理念，促进我国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与新故事创作事业发展，根据首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提议，将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浙江海盐县举办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嘉兴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海盐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

嘉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海盐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盐县民间文艺家协会

协办单位：

《民俗研究》杂志社

二、征文主题

（一）与《搜神记》相关的学术研究：

1.《搜神记》对江南民间故事发展的影响研究；

2.《搜神记》故事类型研究；

3.干宝《搜神记》故事类型和母题在海盐民间的流播研究；

4.干宝所开创的志怪小说文体在海盐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可以海盐籍古代作家的作品为例）；

5.干宝家族后人在海盐一带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含干氏家族史研究）

（二）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史研究；传统民间文学的意义研究；民间文学的创作手法与艺术特征研究。

（三）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创作理念研究。

（四）民间叙事（散文体）田野调查、学术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类编纂工作研究。

（五）以优秀传统民间传说故事为蓝本的文学创作。

三、文稿评选机构

主办方将组织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的部分专家对文稿进行评选。

四、入选作品用途

学术论文（含田野调查报告）汇编为《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正式出版，并推荐在《民俗研究》《文艺报》等刊物、媒体发表。

以优秀传统民间传说故事为蓝本的文学创作作品可择优列入大系出版工程社会普及读本出版计划。

五、相关费用

1.本次征稿活动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2.入选论文作者将受邀参加研讨会，会议期间的城际交通、食宿费用由主办方承担。

3.《论文集》《民俗研究》《文艺报》选用出版的文稿，将在出版后按国家规定支付

稿酬。

六、征稿具体事宜

1．征稿邮箱一：

1005800913@qq.com

联系人：夏许琴（0573-86021689、18857395939）

征稿邮箱二：

18976012533@163.com

联系人：张慧霖（15677378840）

请将文稿同时发送到以上两个邮箱，以便于后续工作开展。

2．应征论文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以便于联络。

3．征文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5 日。

4．主办方对入选论文有修改、发表、出版的权利。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0 年 8 月 20 日

·各地推进动态·

驻马店故事编纂全天候 半封闭

7 月 22 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驻马店分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黄淮学院召开，《驻马店故事分卷》编纂主编刘康健，副主编谭咏利、余全有、赵新春和

专家刘献丽参加。

按照编纂工作计划，此次会议进入精选本编纂阶段，将集中 5 至 7 天时间，在驻马店市黄淮学院教师发展中心采取半封闭模式，对故事卷初选本进行集中编纂。会上，各位主编、专家根据各自的分工，针对雷同故事，如张四妖气、张班、王小等进行归类，对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换、补充和修订，之后由余全有、赵新春两位再进行交换审看，再次查找问题，最后再由刘康健进行主审。

此次审读结束后，将会按照计划，再组织各位编辑对所负责县区故事卷内容再次进行校对、补充、勘误，最终形成精选本定稿。之后，请河南省民协领导和专家莅临驻马店，指导具体问题和细节。驻马店市民协将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地点，再次进行闭封编纂，完成最后冲刺。

（转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深挖民间谜语资源，拓展编纂工作思路——《大系·谜语·河南卷（三）》附录编纂工作会在三门峡召开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三）》其他类（词语、歌谣谜语、故事谜语等）编纂基本告一段落，下一步将转入附录部分的编纂。7 月 24 日至 26 日，编委会在三门峡市文联召开了《大系·谜语·河南卷（三）》附录编纂工作会，有关编委及三门峡市文联、三门峡市民协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三门峡市文联主席刘佰洋致欢迎辞，主编刘二安介绍了《大系·谜语·河南卷》的编纂情况。

《大系·谜语·河南卷》第一卷已于去年 12 月出版，第二卷已通过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专家终审，交由出版社开始编审，预计年内可以出版。在修改第二卷的同时，已同时启动了第三卷的编纂。第三卷的重头戏是歌谣谜语和故事谜语，经过多次修订，目前

已基本完成了正文的编纂，下一步将开始附录部分的编纂，包括河南谜人代表作、河南字谜精选、河南谜史研究文论选辑、河南谜人编纂谜书汇辑、《大系·谜语·河南卷》编纂大事记、主要采录人小传与简况表等，会议进行了具体分工，确定了工作进度。

在编纂《大系·谜语·河南卷》初稿中，发现一批流传谜语较丰富、参与编纂谜语卷成绩突出的市县，以及讲述谜语较多的民间谜语艺术家，曾命名了第一批“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河南省民间谜语艺术家”。在编纂第二、三卷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市县民协及会员作出了积极贡献，补充提供了大批新的资料。经研究决定，命名了第二批“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河南省民间谜语艺术家”，已先后在信阳、商城、固始、平顶山举行授牌仪式，本次工作会期间向三门峡市、卢氏县授予了“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称号。

工作会还讨论了拟编纂《中原采风》丛书的设想，丛书包括《河南歌谣谜语集》《河南故事谜语集》《河南民间字谜集》《乔北海字谜一万条》《河南谜史丛谈》，分别由任建明、吕祥、魏希洪、郑庆元、刘二安负责。

会后，三门峡市民协主席王宏民、副主席王春生、秘书长赵慧利等，陪同编委会成员前往卢氏县调研猜谜歌、字谜歌等歌谣谜语。河南歌谣谜语主要集中在信阳市的商城、固始等县，但在挖掘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南阳等全省各地都有歌谣谜语流传，尤其是发现卢氏县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搜集有猜谜歌、字谜歌，同时配有曲谱，虽然数量不算太多，却都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歌谣谜语，如《对灯谜》《倒十字》等。编委会还新发现了《青红吊打》《螃蟹歌》等歌谣谜语。在卢氏采风期间，邓俊英、王安民等农民歌手分别演唱了卢氏民歌。

（转自微信公众号：灯谜图书馆）

“济南故事分卷”借东风巧扬帆

7 月 25 日，由山东省民协、济南市民协主办，济南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济南市民俗学会承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山东卷·济南分卷》编纂工作研讨会在济南市莱芜区莱芜宾馆会议室举行。

山东省民协主席团委员、副秘书长高光华，济南市民协书记、驻会副主席张佃水，济南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晓华，济南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会长、《济南分卷》主编李胜华以及来自济南市各区县民协文学研究代表等 50 余人出席此次研讨会。会议由济南市民协秘书长都玉梅和济南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名誉主席杨会银主持。

研讨会上，李胜华为大家介绍了《济南分卷》编选工作步骤和各编委会的任务。为了编好《济南分卷》，编委会组织专人到各区县实地考察，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形成了分卷编纂的整体框架。各区县代表就收集情况作出了汇报，分别介绍了精彩的民间文学故事，体现了优良的文化传承，为下一步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后，参会人员集体参观了济南市凤王祥锡雕研究院、济南市民间文学研究学会民俗博物馆、非遗项目陈家糕点民俗博物馆。

民间故事的魅力在于将过去与现在有机联系在一起，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世事如何变迁，隐藏在民间故事里的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风情、心灵律动，都是恒久的存在。济南历史悠久，专家和学者们高度重视《济南分卷》的编纂工作，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编纂任务，作出新的工作成绩。

（山东省民协供稿）

甘肃《大系》《集成》编纂双管齐下

为落实关于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部署，进一步推动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中国民协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与“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传播工程”编纂工作“两大工程”，7 月 23 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中国民协孔宏图处长一行来到甘肃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和指导。23 日下午，甘肃省文联组织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甘肃卷》《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甘肃卷》编纂工作推进会。会议由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渤主持，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马青山、甘肃民协主席徐黎丽、常务副主席杜芳及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马青山就《大系·甘肃卷》工作进展情况作汇报。甘肃省文联、民协积极响应统一工

作部署，第一时间制定《大系》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办公室、专家委员会名单。严格依照《大系工作手册》各门类的编纂工作要求，立足本土民间文学资源，依靠甘肃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力量，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学术主体，落实学术负责人，组建分卷本工作小组，签署合作协议。目前，共启动《传说》《俗语》《神话（甘宁卷）》《故事（陇东卷）》《歌谣》《长诗》6 个卷本，基本完成前期文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筛选工作，今年年底前可提交除《俗语》外的其他 5 卷送审稿。计划进一步启动《小戏》《说唱》《史诗》《谚语》4 个卷本编纂工作，力争在《大系》规定的时限之内完成甘肃卷所有工作。同时，会议还就受疫情影响，工作进度一定程度上有所迟滞，一定数量文本的讲述者（演唱者）、采录时间、采录地点等因时过境迁存在缺失，个别卷本部分地区文献（文本资料）还不充分等问题做出分析，以期进一步沟通与解决。

甘肃省民协名誉主席、《集成·甘肃卷》负责人王贵生汇报工作进展情况。陇东南组、陇中组、河西组分赴三大片区作田野调查和初步信息采集，覆盖甘肃 2/3 地区，完成近 1/2 调研内容。目前代表性作品图谱、工艺流程、工艺思想等章节需进一步推进，深入补充第一手资料。同时，就人员数量、信息采集渠道、信息来源、经费管理等做出汇报和分析。

《神话（甘宁卷）》主编、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贵生，《传说》主编、兰州大学教授刘文江，《俗语》主编、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雒鹏，《故事》主编、兰州文理学院教授徐凤，《歌谣》主编、甘肃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戚晓萍，《长诗》主编、兰州城市大学教授白晓霞就书稿进度和致力求解的问题做出汇报阐述。

潘鲁生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关心文化事业，关怀文艺发展。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民间文艺的研究之中。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是新时代全国民间文艺界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深入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举措。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对“两大工程”的辛勤付出，从中可以看到，甘肃省文联党组高度重视，甘肃省民协组织工作十分到位，专家学者尽心尽力，编纂工作在整体上顺利推进。

潘鲁生说，今年是中国民协成立 70 周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成立之初，就将根本任务确立为“广泛地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对民间文学进行集成性的采集与研究整理，对民间文化遗存进行广泛深入的普查、研究、抢救和保护。秉承学术立会的传统，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作为民间文艺保护、传承与创作发展的支持和保障，专家学者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新时代，“两大工程”仍然要依靠专家学者的力量，编纂出版世代传承的民间文学大系，辑录和整理长期处于散佚状态的民间工艺。要关注民间文学的“活态性”，民间工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生活观”，采集记录与普通百姓生产生活方式相关的工艺品类，有历史传承、深厚文化基础，有相关民俗事相为支撑，突出学术规范，深入把握民间文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要坚持“人民性”的编纂理念，为民间生活存录、为劳动者立传、为民间艺人立档存志，在“两大工程”成果中体现对人民劳动创造的礼赞。甘肃要立足民间工艺资源，遴选特色的工艺品类，突显地域特色和民族风貌，争取今年年内交稿。同时，潘鲁生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省市自治区民协“三套集成”资料库与中国民协“民间文学数据库”的作用，并就相关编纂问题做了解答。

最后，王登渤作表态发言，对相关工作指导表示感谢。他表示，甘肃省文联一直高度重视“两大工程”编纂工作，将尽力协调解决有关人才配备、资料获取的具体问题，希望大家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加以对待，按时保质完成编纂任务，恳请中国民协今后加强工作指导。

（孔宏图）

以点带面，全力推进 ——安阳分县区启动传说、故事卷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化积淀，广泛流传有大量民间故事传说。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安阳市及所

辖五县都编纂出版了“三套集成”故事卷；进入 21 世纪，又有五县一区编纂了民间故事全书，部分民协会员、民间文学爱好者还编纂出版了一些民间故事图书。这些丰富的资料，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安阳分卷》《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河南卷·安阳分卷》（以下简称《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大系出版工程办公室批准，《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的编纂已列入 2020 年工作计划。为尽快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安阳市文联、安阳市民协及时组建了编委会和编辑部。编委会成员由安阳市委宣传部、安阳市文联及各县（市）区文联、民协负责同志组成。编辑部由具体进行编纂工作的人员组成。

启动之前编委会已经作了充分的前期资料准备，一方面将各县区编纂“三套集成”以来的资料，分为既有电子版又有印刷版和只有电子版或只有印刷版的分别整理，无电子版的尽快转电子版；另一方面建立了微信“安阳故事传说征集群”，广泛动员安阳市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未收入“三套集成”和故事全书的资料，共同参与到编纂工作中。与市文化广电体旅局非遗科结合，整理安阳市已列入非遗项目的故事传说。各县（市、区）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卷、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市）区卷的基础上，以各县区已编纂完成的民间故事全书主编为主，组成各县区编纂组；还筹备召开编纂人员培训班，请有关专家授课，并将组织相关编纂人员到鲁山县学习故事卷、示范卷、平顶山卷的先进经验；印制有关工作手册、编纂体例等，供编纂人员参考使用。

为加快征集与编纂，以点带面，全力推进，扎实开展工作，编委会确定分县（市、区）陆续召开编纂工作启动会，首批在龙安区和安阳县召开。

8 月 7 日，《安阳故事/传说分卷》龙安区编纂工作启动会在区政府会议室召开。出席启动工作会的有安阳分卷编委会、安阳市民协主席团有关人员及龙安区文联、各乡镇文联负责同志。龙安区文联主席段瑞峰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了龙安区概况及民间文学流传情况。龙安区是 2003 年初安阳市区划调整时，在原郊区基础上新组建的。近年来，部分乡镇整理编写了当地民间故事，部分民间文学爱好者还搜集整理了一些民间文学资料。安阳分卷常务副主编、安阳市民协主席史志宏宣读了安阳市文联“关于征集《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编纂资料的通知”，号召全区各级文联积极组织人员，投入到安阳分卷的搜集整

理工作中。安阳分卷主编、安阳市民协名誉主席刘二安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概况，介绍了安阳市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三套集成”、21 世纪初民间故事全书，直到今天《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的编纂过程，并就安阳分卷的编纂作了具体部署。安阳所辖各县均已出版或编纂了“三套集成”故事卷和故事全书，龙安区虽因组建较晚，未编纂集成和全书，但在建区不久就编纂出版了《龙安传说》，内容包括传说、故事、歌谣、谜语等，堪称龙安区的“三套集成”。编纂人员将在《龙安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本区民间文学资料，为安阳分卷的编纂提供更多资料。与会的马投涧镇、善应镇、马家乡等各乡镇文联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本地民间文学流传与资料状况：已编印了《南岭故事》《紫金山古文化传奇》等内部资料，许多村志收录有本村流传的民间故事，善应镇等乡镇还保存了非遗普查时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其他各乡镇也表示，将集中组织一部分退休教师搜集整理故事传说资料。为了促进搜集与整理，启动会现场建立了微信“龙安区故事传说征集群”。

8 月 14 日，《安阳故事/传说分卷》安阳县编纂工作启动会在安阳县文联召开。出席启动工作会的有安阳分卷编委会、安阳市民协主席团及安阳县文联、县民协主席团有关成员，各乡镇民间文学爱好者等 20 余人。安阳县民协主席张永军主持会议，县文联主席王兴学致词，介绍了安阳县概况及民间文学流传情况。安阳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民间文学积淀也非常丰厚，民间文艺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安阳县民协曾获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集体成就奖。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安阳县相继编印了“三套集成”故事卷《狐狸坟传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阳县民间故事集》，还有专题民间故事集《民间说曹操》《韩陵山的故事》、市级非遗项目“赵家牌坊的故事”等，民间故事传说资料比较全面。史志宏宣读了安阳市文联“关于征集《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编纂资料的通知”，刘二安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概况，介绍了“三套集成”、民间故事全书、《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的编纂过程，并就安阳分卷的编纂作了具体部署。安阳县民协在会议之前，已创建了微信群开始征集资料，到会的崔家桥、永和、高庄等乡镇的民间文学爱好者汇报了当地民间故事流传情况，并已分别搜集了部分民间故事。安阳县编纂组拟在三套集成、故事全书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故事卷、传说卷编纂体例，整理已

有资料，补充新发现的资料，丰富安阳分卷的内容。令人欣喜的是永和镇发现几个讲述故事较多的村庄，编委会将于近期组织人员前去调研考察。

《安阳故事/传说分卷》编纂工作启动会，还将陆续在安阳各县区召开。

（转自微信公众号：安阳市民间文艺）

奋马扬鞭疾向前——黑龙江故事卷取得阶段性成果

8 月 7 日至 12 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黑龙江故事卷的汇稿工作如期进行。经过 6 天全封闭式、高度集中、严谨认真的研讨、校对、修改，主编郭崇林及编委会成员尹树凤、陈凤初步完成黑龙江故事卷上卷“人参故事”“渔猎故事”“幻想故事”以及“生活故事”主体章节的汇稿工作。这标志着黑龙江故事卷编纂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收集整理民间故事作品，绝不是单纯的民间故事作品集，而是故事文本的相对完整的呈现，要充分展现民间故事的田野调查成果和当代研究水平。民间故事是讲述出来的，既要记录讲了什么，也要描述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编委会严格按照工程要求，进入故事卷的故事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故事作品，二是故事讲述的语境。相较于故事作品，读懂故事文本之外的信息，从而较为客观、相对完整地展示民间故事流传原生态，是这次《大系》编纂的意义所在。编委会的此次汇稿着重对故事分类的合理性，正文字词句、标点以及注释、附记、异文等内容的规范性、科学性等进行逐篇逐句逐字的检查、推敲和研究，既注重保证故事内容文本的科学合理，又注重体现黑龙江故事的地域特色，保持东北方言原汁原味的口语特点。

（转自微信公众号：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辽宁卷说唱卷观照历史

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抢救民间文学的重大举

措，首批推出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12 卷本现已出版。

辽宁作为民间说唱艺术重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被列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成为首批出版示范卷。此次民间说唱文学被纳入出版工程，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举，无论是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还是传承意义，都不可低估。

民间说唱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零金碎玉，散落民间千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是有说唱历史以来第一次将地方的民间说唱艺术编纂成卷。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集大成之巨献，此次首批推出 12 本示范卷，涉及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民间文学理论等 12 个门类，辽宁、河南、河北、四川等 9 个省份入选，辽宁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入选。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说唱文学宝库中，辽宁说唱艺术是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二人转、东北大鼓、子弟书、莲花落、相声、评书等说唱形式或者起源于辽宁，或者被辽宁百姓喜闻乐见而逐渐流行于东北乃至全国。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的率先出版，给正在编纂中的全国其他省卷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选录作品分为散文、韵文两大类别。散文部分包括评书、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韵文部分包括子弟书、东北大鼓、京东大鼓、二人转等，全书近百万字，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入选作品皆为 1949 年前在辽宁地区广为流传的说唱艺术形式，其中包括辽宁本土曲种子弟书、东北大鼓、二人转等；外来曲种西河大鼓、评书、相声、莲花落等。这些常见曲种多以讲述故事为主体，节奏明快，情节紧张，符合东北人民的审美需求。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说唱”专家组副组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主编崔凯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被列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首批出版系列，这是对辽宁文艺界的信任与重视。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的过程中，他和编纂者们一直怀着对民间艺术的敬畏和历史的责任感在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有说唱历史以来第一次将地方的民间说唱艺术编纂成卷，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辽宁是民间说唱艺术的重镇，在历史上有过很多著名的民间艺人，留下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但由于年代久远，失传的很多。

编纂这样一卷具有史料价值的书谈何容易！崔凯介绍，编纂难度超乎想象：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形成文字的民间说唱文学数量很少，可以直接收录的作品几乎没有。二是 1949 年以后正式出版发行的民间说唱文学作品数量巨大，可除了评书作品以外，其他说唱文学作品都经过了改编和整理，基本失去了民间说唱的本质属性。三是现今能够找到的说唱文学作品与民间说唱艺人的演出作品相去甚远，基本上属于阅读文本，缺少民间说唱的鲜活性。如果图省事，把曾经出版过的说唱文学作品分类编辑成册也可以完成《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的编纂任务，可这样就违背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的初衷，也不利于民间说唱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面对难题，中国民协组织召开了编纂工作推进会。请来潘鲁生、邱运华、王锦强、苑利、常祥霖等专家学者，针对遇到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崔凯说，辽宁省文联对专家组的意见高度重视，重整旗鼓、分工合作，大家深入基层拜访民间艺人，收集不同版本的民间说唱作品进行对照比较，确定入选书目、曲目，同时还从民间收集了部分音频、视频资料和相关图片资料。经过多次筛选与调整，选定了在辽宁地区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优秀传统说唱作品 21 种、216 篇进行了梳理编纂。

辽宁评书是中国北方评书的重要代表，许多评书名家曾在辽宁工作过。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收录的 18 部评书中，不仅有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等名家作品，还收录了李庆溪、聂田盛、陈青远、刘彩琴、石联君等人的作品，因为年代久远，资料很难找，但编纂者们不畏艰难，千方百计去收集，尽量使这些人的作品留下。

崔凯认为，辽宁评书流派纷呈，各有自己的特色，如陈青远是唱东北大鼓的，他的评书就保留了上韵、口白等东北大鼓中的一些特色；刘彩琴原是唱西河大鼓的，她说的评书有很多西河大鼓的特色。在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尽量把辽宁评书艺人的特点全都表现出来。这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辽宁评书的面貌。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凸显了说唱文学将“说什么与怎么说”“有意义和有意思”充分融合的鲜活特色。

辽宁省民协负责人刘蕾说，民间说唱文学作品仅仅是民间说唱艺人进行表演的文本记录。单纯阅读这些作品，很难感受到民间说唱艺术的精彩与魅力，更难以领略民间说唱艺人高超的表演技巧，特别是有些流传广泛的说唱作品，从文本上看存在着节外生枝、画蛇添足、情节重复、语言累赘等诸多问题。可是，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的文字，恰恰是民间说唱艺人展示表演技巧的华彩桥段，如果删除就十分可惜。为了真实再现民间说唱艺术的原本特色，编纂者努力收集了一些与作品相关的音频、视频资料，希望出版时以“附二维码”的形式同时发表，尽管与原有作品不能完全对位，但可以让读者或说唱艺术研究者看到某些民间说唱艺术种类基本的表现形态。

长期流传于旧时代的民间说唱作品，必然会带着历史的痕迹。编纂过程中，对一些作品中带有的封建迷信、暴力、低级情趣内容进行了慎重取舍，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删除了一些与中华文化价值观相悖的内容，保留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民间传统说唱中较为常见的内容。为了体现旧时代民间说唱艺人的表演和生存状态，还收录了一小部分从未发表过的艺人为卖艺赚钱使用的短篇说唱内容，供学术研究者参考。

崔凯说，编委会组成之初制定的原则是：努力寻找原著，或是采用民间艺人的口述本，尽量保持其本真风貌。

辽宁是东北相声的重镇，辽宁相声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收集相声作品过程中，不但收集了 27 段对口相声，6 段单口相声，6 段群口相声，而且还把传统中撂地儿演出的开场小唱儿、太平歌词都收入到相声部分里。开始时专家组有不同意见，认为太平歌词、开场小唱儿应该放到韵文里。崔凯曾向老艺人祝敏、于春明和相声研究者刘英男请教，又与专家组反复沟通，最后将太平歌词、开场小唱儿编到传统相声部分里，恢复了相声撂地儿演出的原貌，这为传统相声研究提供了资料佐证。这些 1949 年以前的濒于失传的作品被收入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让它们有史可查，免于失传之危，让人们看到这些传统相声真实的演出形态。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说唱”专家组副组长孙立生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极富地域文化色彩。说唱文学的最大价值是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的协调统一，素有“老百姓开心钥匙”的美誉。其结构、情节大多具备“四两拨千斤”的巧妙

之处，能像钥匙开门一般打开听书人的心灵。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曾经在东北流传过的具有代表性、在大众中有影响的说唱形式都在此卷里体现出来了。

二人转是东北独有的说唱民间艺术，很多传统作品在东北都是通用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收入的传统作品如何有辽宁特色？为此，崔凯多次去黑山县寻找，因为黑山县是东北二人转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还坚持二人转艺术的传统演出方式，还能看到原始的二人转演出。崔凯多次与黑山县的民间艺人交流，深入了解原始二人转特色，此次编纂的 20 篇二人转作品，主要采用黑山县民间艺人演唱的原始作品，如《大西厢》《蓝桥》《李翠莲》《包公赔情》等，这 20 篇作品都具有浓郁的辽宁风格。

这些作品大都是口传心授的文本，保留了民间文学口语性、大众化、地区性特色，方言土语采取了注释的方式，不了解东北方言的人通过注释也能够看懂。同时，记录了部分健在老艺人的口述文本。对于已故的老艺人，编委会经过调查，从其家属手中收集部分手抄文本，再经精编，入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

子弟书是清朝八旗子弟创作和表演的说唱作品，早已不再有演出，经过艰苦努力，此次收集了大量子弟书作品，最后选中 47 篇编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这是对子弟书民间流传作品的一次最全面的收集整理，一些曾经流传到东北地区乃至京津地区的好作品都收录进来了。

东北大鼓发源地在辽宁，曾经叫奉天大鼓，也是这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收录的一个重点。东北大鼓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把霍树棠、刘问霞、朱玺珍等著名民间艺人的代表作都收录了。除此之外，在东北曾经有过的一些艺术形式此次也收录在内，满族单鼓、莲花落子等已经失传的作品都有收录，弥补了民间说唱种类的空白。

孙立生说，透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可以看到一群对中国民间说唱文学怀有真挚情感与责任担当、有深入研究与严谨治学态度、有真知灼见的令人钦佩的编纂者。

专家们认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曾经在东北流传过的具有代表性、在大众中有影响的说唱形式都在此卷里体

现出来了，对其他将要参与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省份具有示范作用。

（转自学习强国 APP，原题为“传承意义重大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出版 给传统说唱艺术留下最本真记录”）

学术视野

云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回溯

刘建波[1]

彩云之南是多民族世代生活的福地，也是民间文学活态发展的沃土。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奠基人钟敬文先生曾说：“民间文艺，是民众直接创造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还是各民族伟大作家创造的有力的影响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传承载体，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道路上愈发显现蓬勃生机。站在新时代，回顾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过往，既是继承历史、观照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学术之旅，也是发挥人文学科助力社会发展的担当之举。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对它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但毫无疑问，1949年“边纵”队员杨放对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从那时起，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已走过70年春秋。一路走来，历次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都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文联、文化局、高校等多部门团结协作，工作队员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村串户，拜访民间歌手和祭司，从一个民族到多个民族，从神话故事到史诗歌谣等多题材先后被发掘、整理和出版，呈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百花盛开的景象。这一史无前例的搜集整理工作，激发了各族人民寻找民族“根谱”的热情，在百花园中寻找本民族的“阿诗玛”，

[1] 刘建波，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彝族民间文学，神话学。本文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20年7月3日第5版。原题为“呈现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回望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

各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由之前的自卑变为自信。搜集整理工作既锻炼了一批热爱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学生，更培养了本土的民间文艺人才，以康朗英、康朗甩等为代表的歌手为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学起到重要作用。

一、全面搜集整理的黄金期：发现和发掘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宝藏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省开展了 3 次有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打开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大宝藏。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云南省文化局、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文工团等组成若干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全省各地发掘民族民间文学。例如，1953 年，以云南省文工团为主力的圭山工作组赴路南（今石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搜集整理叙事长诗《阿诗玛》，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形象从此深入人心。《阿诗玛》的成功搜集整理，让闪烁着“人民性”本质特征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向了世界，也极大推动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1956 年，又组织 3 个调查组赴红河、大理、思茅、丽江等地区，并初步形成哈尼、白、彝、傣、纳西等民族的民间文学情况报告，为后来撰写各民族文学史打下坚实基础。1958 年，“新民歌运动”拉开序幕。云南省组织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 1955 级学生、部分文艺干部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组成 100 余人的 7 个调查队，分赴楚雄、大理、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地，按照“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对各民族民间文学做全面调查。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白族故事《火烧松明楼》等一大批民间文学作品被发掘整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经典。此后，云南省又曾几次组织调查组对拉祜、傈僳、独龙等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调查，更加深入、全面、系统了解各民族民间文学情况。

在全面搜集整理期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巨大宝藏从首次发现到资源发掘，从一个民族的文学搜集整理到多民族全面翻译整理，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到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话题讨论，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呈现了云南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

二、选编作品的新时期：普查性搜集和编纂云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有力推进，得益于多方面力量的有力支援。在“前

二十七年”，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诗人袁勃，云南省文联主席、学者徐嘉瑞等亲自参与搜集整理，《逃到甜蜜的地方》《望夫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例证。云南省文联（筹委会）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指导和规划。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 1981 年云南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等专业性的业务机构先后成立，为新时期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普查搜集和作品选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 1984 年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全面推行。云南省按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集成资料编辑体例要求，广泛发动各地力量，全省各州、市，各县、区都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专门负责民间文学集成选编工作。历时 20 年，共普查搜集到 1 亿多字、300 多部资料集，成为编辑集成的重要基础。云南省成功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谚语集成·云南卷》，共计 600 多万字，于 2004 年正式出版发行。“三套集成”（云南卷）成为具有历史文献性、学术资料性和文学代表性的民间文学丛书，被誉为云南文化“长城”。

三、民族古籍翻译的新世纪：书面与口头民间文学共同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不仅以口头形式传播，还通过民族古籍文献记载方式流传至今。在云南的世居少数民族中，彝、纳西、傣等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千百年来，这些民族不仅用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口头民间文学，还用民族文字将之记录在册。因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等息息相关，民间的知识分子兼宗教祭司，诸如毕摩、东巴和赞哈等成为本民族最权威的民间文学传承者。改革开放初期，在“救人、救书、救学科”精神指引下，一批民族翻译人才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后，深入乡村，向毕摩、东巴、赞哈等收集、翻译和整理大量的民族文献古籍和口传古籍，成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来源。云南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少数民族古籍征集抢救保护工作。新世纪

以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 卷）、《中国贝叶经全集》（100 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等先后出版，成为涵盖民族神话、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多种类别在内的精品力作。《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等，都是民族古籍文献中民间文学精粹的汇编，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范围“非遗”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2004 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抢救工作走上法制化道路，一大批曾在黄金期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列入国家和省级保护名录。例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史诗《梅葛》《查姆》，哈尼族的“四节生产调”、哈尼哈巴，纳西族的《黑白战争》，拉祜族的叙事长诗《牡帕密帕》，阿昌族的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佤族的史诗《司岗里》等，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应地，王玉芳、郭有珍、方贵生等一大批民族歌手、民间文艺人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效保障了民间文学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此外，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昆明、大理、丽江等市、州的又一批民间文学经典入选，为“非遗”保护增添新的成果。

四、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必将迈上新台阶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被列为重点实施项目之一。大系出版工程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原则选编，以省立卷，按体裁归类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到 2025 年，预计出版民间文学各类别的大型文库 1000 卷，共 10 亿字，并建成“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云南省以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多元的民间文学内容和多样的民间文学文类，积极助力大系出版工程。2019 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二）》作为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向世人展示了云南民间文学的丰富性，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与发展的热潮。

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在筑牢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石，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必将从全面发展走向辉煌绚丽。

·论文推介·

◆《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传承》

【作者】宁梅（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鲁母化生型”神话是藏族化生型神话的重要类型，延展到藏族现代生活中，呈现出习以为常的模式化现象。《格萨尔》史诗等口传文本、风马旗图像、祭海仪式等纷繁物象，与苯教文献记载的“鲁母化生型”神话叙事构成对应。此种依仗人类通常具有的神话信仰的大传统知识，不仅是人类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主要来源。

中国文学人类学提出的“文化大传统”理论，将无文字时代文化称为“大传统”，将文字出现后文化称为“小传统”，颠覆了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以西方文字书写为重的大小传统格局。“文化大传统”关注文学发生的最初原貌，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动力源泉。笔者以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为切入点，以藏区常见的鲁神信仰民俗图像、仪式、口传叙事等补充纯文字叙事，并揭示“鲁母化生型”神话背后的文化观念。

一、“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符号

“化生型”神话属创世神话中的一种，主要讲述万物生成、天地开辟、人类起源。藏族的龙有两种，一种叫“祝”，是一种动物龙，从不以人和神的面目出现，形状与汉族的龙相仿；一种叫“鲁(龙）”，“鲁”则为人们一般所说的龙神，是苯教的一种重要神灵。“祝”是“鲁”的一种，但“鲁”不等于“祝”。笔者“鲁母化生”神话中的“鲁（龙）”属于后者。“鲁母化身万物”创世神话类型最早在藏族龙母创世神话辑本《十万龙经》之中有记载，在汉地、古巴比伦神话均能找到踪迹。印度婆罗门教经典书籍《奥义书》中的

《梨俱吠陀》亦有记载。因此它包含着汉族、印度等民族和国家的信仰因子。

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藏族人认为龙神像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住所，几乎无处不在。龙神形象亦较为奇特，藏族龙神究竟属于哪一种动物尚不确定，只是笼统地认为龙神的基本形态是蛇或鱼，兼有马、牛、羊、猪、虎等古代人类常见兽类，是由多种动物特征结合而成的可以随时附身或变化的精灵，生长在水中或是地上，与鱼、蛙、蝌蚪、蛇等有关。随着藏族原始宗教的发展，龙神形象不断被社会化和人格化，并赋予善恶观念，社会职责愈加明晰，家族愈加庞大，种类愈加复杂。

“鲁母生万物”的创世神话是藏族人最早产生的一种神灵信仰。藏族人对龙的崇拜一直可以追溯到吐蕃以前。藏族苯教经典《十二万龙经》（简称《十万龙经》，也称《花黑白十万龙经》）记载：世界起源于龙，龙是世界之母，即“龙母”，它直接表示世界的次序，有“龙母创世”一说。

藏族起源神话叙述了宇宙和人类从世间卵生成拉神(天界神）、念神(中界的半神）和龙神(水中和地下的精灵）的降生过程。《十万龙经》将宇宙天地分为三界：上界住的是念神，中界住的是地主(地祇），下界大海里有五百座龙宫，龙宫里住着龙王龙女，过着与地上人类一样的生活。三界神灵作为藏族原始神灵的信仰一脉相传，亘古未变。

藏族古代以“仲”(叙述故事）、“德乌”(象征性语言）和“苯”(苯教）治理王政。民间文学和原始宗教在民众中间影响巨大。通过讲神话故事，达到使民众了解和执行上层政策的预期目的。“仲”（叙述故事）范围指涉《格萨尔》史诗、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故事等具有历史事实和文学叙述的藏族世俗文学，这类文学都源自创世神话。藏族古籍文献《柱间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中有很多历史事件的记述，其中民间传说、神话占有很大比例，不少被编成长篇问答歌世代传承。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在藏文史籍《柱间史》《西藏王统记》都有涉猎。

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认为，西藏神灵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早、中和晚三个时期。早期龙不但形象模糊，而且居地纷繁。中期龙神已有明确分工，可分为善龙神、恶龙神、善与恶兼而有之的龙神这三类。晚期龙神强化了善的特征，并将龙神与吐蕃至高无上的神灵家族联系在一起，人们对龙神的崇敬心理逐渐强烈。

藏族存在“龙为贵种”为特征的崇龙信仰，并将其与王权相联系。遵循世界创造和人类起源两大主题叙事逻辑发展出来的龙女婚恋故事类型，已经有了鲜明的自觉意识和人性色彩。以原始民众信仰为依托，藏族口传叙事中出现的龙女，与藏民族中的王公贵族、英雄人物结合，诞生出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与龙族通婚的观念源于藏族苯教信仰，三界神灵与人类不仅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而且其后代也可互相往来，甚至通婚。民间传说苯教始祖辛饶米沃降临人间之后，与龙女结合，生下一个女儿。从此给世界带来了好运，藏地进入雨水充足、庄稼丰收的平安时代。吐蕃早期赞普对此深信不疑，热衷于娶龙族之女，以达到给吐蕃带来好运的目的。格萨尔就是天神与龙神的结合，凝聚了天神、念神、龙神三界神灵的血统，出身高贵，神通广大。历代统治者自称“龙子”，龙成为人类始祖、至高王权的象征。同时，龙可以是为黎民百姓司云雨、保丰收、守护一方水土平安的善神，也可以是兴风作浪祸害人间的恶龙。

龙神为财神。藏族民众认为，龙神与人类一样有家有室，有情感思想，并拥有人间难以寻觅的一切财宝。供奉龙神，可以使财富源源不断。格萨尔娶龙女珠姆为王妃，意味着格萨尔继续保持着其父辈与龙族通婚的传统。嘉洛部落的头领顿巴坚参一生供奉嘉陵湖弥贡龙王，并娶了龙王女儿为妻，财源茂盛，成为岭国第一富户。据研究，珠姆来自青海玉树治多县的嘎嘉洛家族。治多县珠姆湖、珠姆上半截身体塑像，大量风物遗迹传说是民众对誉为白度母的珠姆最好的纪念。而格萨尔的母亲果姆携带着象征龙界精神财富的《十万龙经》、良好居住条件的廷肖古大龙帐子和发家致富之财运的福角龙畜母牦牛三件龙宝，从龙宫来到人间。《格萨尔》中的三界神灵与《十万龙经》中的三界神灵稍有不同，《格萨尔》中上界是天神住所，它的主宰是白梵天王，中界是念神的住所，其主宰是格卓念波，下界是龙族的住处，其主宰是顶宝龙王。

龙神是雷神，一般住在云层或天空中，主管水神和冰雹。《格萨尔》史诗中，龙神出现频率极高。在《格萨尔·降伏妖魔之部》中，青青高原上的玉龙，住在厚厚的紫云城；发出猛烈吼声亦威武，抛出赤电长舌像箭锋；一下就劈烂芝麻鹰窝，一击就粉碎红石峰。

据《十万龙经》记载，人间 424 种病根源于龙。因龙与龙病、降雨、财富有着紧密关联，藏族民众会围绕着祛病、求雨主题进行祭祀，治疗瘟疫疾病，即“龙病”。祭祀场所

通常是水域，祭品是鱼虾喜爱的食物，或为藏红花、仙人掌等药材。这些祭品被称为“龙药”。出于对龙的敬畏，民间禁止向水域倾倒污秽物，禁止捕食鱼、虾、蟹、蛙等作为龙化身或眷属的水生动物。龙病一旦传染给人类，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而龙族也害怕生龙病。《格萨尔》史诗记录了许多藏族古老的龙神信仰习俗。莲花生为了求得一位龙女给格萨尔做母亲，不惜给龙界降下瘟疫，并以龙王三女儿为交换，为群龙治好了龙病。莲花生将龙女带到人间，配与僧伦。之后，龙女生下了格萨尔。

传说中龙魔九兄弟非常凶横残暴，能够带给人类胆病、麻风病、水肿病、剧痛等病症。恶龙故事反映了藏族先民欲征服自然的思想动机和价值取向。故事结尾都是恶龙被征服，从而演化出很多崇拜龙的习俗，如祭龙节。拉萨龙王潭供奉的名叫墨竹色青的俊俏龙女的故事被记载在桑耶寺的壁画中。

在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遗址中，狮、象、马、龙神等图案随处可见；西藏曲贡遗址发现刻有蛇纹的陶片，显示出藏族古代氏族部落崇拜龙神；内蒙古清水河县岔河口发掘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两条巨型鱼龙形夯土雕像，等等。大量“鲁母化生型”神话原型叙事的考古遗址发现、日常生活中图像符号、苯教文献等文字文本、《格萨尔》史诗等口传叙事都是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物证和物化体现，构成了文本与物象上的对应。

二、“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历史文化信息

神话是人类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具有信史价值和象征价值。研究神话，可以钩沉历史，透视古人的思想、观念等，如青海祭海仪式历史。上文提及，龙神主管着人世间雨水，求雨就是求龙神。一年一两次的祭海仪式是藏族民众生活中已然模式化了的民俗活动，祈请湖泊神灵降福众生，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和顺吉祥，表达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青海湖祭海在 2008 年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青海湖仪式早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有“燎祭西王母”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封青海湖神(西王母）为“广阔王”，遣使礼祭。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加封青海湖神为“通圣广阔王”。理宗宝祐元年（1253）蒙古用兵青海，宝祐二年(1254）召集蒙古王公在日月山祭天，在青海湖祭海，这是封建统治者亲自祭海的最早记载。道光三年(1823）陕甘总督那彦成命环海八族藏人祭海会盟，这是藏族祭海会盟之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

西宁办事大臣为便于向海神致祭，决定修建海神庙，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作为固定的祭海场所。庙正殿中立碑一座，上刻“灵显青海之神位”（西王母）七个大字。此后被砸毁拆除，现仍留有遗址。

再如在藏区常见的，以经咒、图像印于粗布上的五色小旗——风马旗。藏族人叫“隆达”，直译为“风马”。风马旗正中是一匹奔马，四角印有四只神兽：上方为大鹏、绿龙，下方为红虎、白狮。文字安插其间。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逢年过节都要插挂五彩风马，喻示着天、地、人、畜的和谐吉祥。风马旗一般是以家中年长者的五行命相为主幡的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五行配五色。主幡的镶边运用五行相生的原理。藏族五行算中称之为“母子关系”。龙象征水，代表繁荣；雪狮象征土，代表命运；大鹏鸟象征火，代表生命力；虎象征风，代表身体；居于中央的腾飞骏马则象征土、水、火、风所依附的虚空，代表着万物的灵魂。谢继胜、康格桑益西等学者认为，风马旗的起源与阴阳五行思想等密切相关，“五兽”及“四方”概念寓意着藏民族形成、信仰象征及早期藏族氏族图腾象征。

中国历史具有鲜明的“神话历史”特点。苯教经典中明确指出：“董、扎、珠、噶”四个藏族古老部族的战神分别为“铜鬃玉龙、弯喙铁爪大鹏、利角神牦牛、朱砂斑金虎”四种。从藏族氏族图腾符号，可窥见藏族氏族部落联盟统一的历史。《格萨尔》史诗也有同样叙述：在天地混沌时，有两只鸟在空中造窝，一共生下 18 颗卵。三颗鸟卵向上去，生成天界；三颗鸟卵去中空，生成念界；三颗鸟卵去下方，生成龙界；六颗鸟卵落人间，生成原始藏人的六大氏族。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传说时代的氏族部落在不断的融合中发生变化，对作为氏族图腾标志的图腾动物的认同也逐渐发生改变。时至今日，藏区寺院壁画上仍保留着的各种动物画像，可以作为藏族历上曾经有过图腾崇拜的佐证。

三、“鲁母化生型”神话的文化编码

藏族现代生活中与龙相关的种种神话仪式、图像、口头叙事、考古发现和文献古籍，都是神话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密码和文化奇观。神话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是人类灵魂之根，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主要来源。神话不仅具有信史价值，还具有象征价值。在现今的文化体系中，风马旗含有多重象征意义。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公元

前 245 年）的阿育王石柱的圆形台基四周有四个守卫四方的守兽：东方是象、南方是马、西方是牛、北方是狮。这四种代表四方国度的动物，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成为藏族风马旗观念起源的雏形。在中国古代天文观念中有“四象”七大星区说法：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天人感应论、天命论、五行观等古代各种文明思想的交流，使得神话故事作为思维编码的一种符号方式，体现出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规则。

英国藏学家噶尔梅在《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意义》中阐释道：“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神与魔、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创造与毁灭等二重性构成了苯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创世神话“鲁母化万物”蕴含着古老的二元论、三界宇宙观及五行观等思想。

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劫数（鸿蒙年代）之时，首先出现了水，水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地球的中心是金刚座（菩提道场，坚固永恒的地方）。地球的形成依赖地、水、风、火。地属于固性，水属于湿性，风属于动性，火属于热性。这四种现象互为作用，使得天地有别。《智者喜宴》写道，大海里首先出现一金龟，它气宇轩昂，头朝南方，右翼朝东，左翼朝西，四肢控制着四方。因此，这个世界出现四个方向：东、西、南、北。这个世界因缘和合，始终都在变化，直至毁灭。毁灭的途径是，水、火、风。水要淹没整个世界，诸如暴雨、洪水、海啸等；火要烧毁整个世界，诸如地震、火山爆发、山林失火等；风要刮跑整个世界，诸如龙卷风、台风、暴风等。

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在数亿万年前是海洋。20 世纪 60 年代，在喜马拉雅山脉希夏邦马峰及聂木拉县发现距今 1.8 亿年的“喜马拉雅玉龙”。1976 年，在西藏昌都达玛拉山脚，发现距今六七千万年前恐龙化石。大传统理论将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口传文本、物化图像等联系起来，在口传史诗、神话图像、民间叙事等诸多证据中，将“鲁母化生型”神话转换、意义表达阐释得清楚明白。

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鲁母化生型”神话具有超越文化的相似性和潜在的普遍性。与其说是受印度神话、汉神话影响，不如说是万物有灵、物我化一等神话思维使然。“鲁母化生型”神话蕴含着藏族古老三界宇宙观、五行观等神话宇宙观的时空循环性结构，藏族现代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风马旗中的“五兽”神话符号象征着生命的本源，寄寓着对人类自身生命生产的关切，反映出具有直观性和具象性特征的人类神话思维

的“神话中国”。神话作为一种特有的智慧表述与文明基因，并非藏族《格萨尔》史诗这一部特定作品，亦非在藏族日常生活中以“扩展”形式蔓延的风马旗、祭海仪式等神话性，而是对全人类的观念信仰、行为礼仪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的内在价值观和宇宙观所支配的文化编码。中国多民族互动融合的文化大传统，突破了文字的局限，在活态文化传承的民间叙事和仪式礼俗中，在禳灾和治病的讲唱表演活动中，在考古发现的图像叙事和实物叙事中，解读神话思维，发现神话意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神话信仰的意义。

【刊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民歌视角下京津冀地区民间刺绣的艺术原型研究》

【作者】滕雪梅　王熠（均为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摘要】民间刺绣是一个地区女性群体的乡土文化记忆，本文以民歌视角解读京津冀地区民间刺绣，剖析刺绣创作的来源和艺术原型，结合乡村朴素的生命情感观念，分析人们通过刺绣所要表达出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

京津冀民歌中有一类专以刺绣为题材的歌曲，这一题材对民间刺绣进行了详细描述，为刺绣纹样的考辨提供了证据，有助于还原刺绣者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了解她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信息。可以说，从民歌角度的切入为民间刺绣文化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京津冀地区刺绣题材的民歌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乡村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刺绣一般由母女或婆媳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传承，民歌是“言传”的形式之一，这也就产生了一部分以刺绣为题材的民歌作品。1963 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委会在河北省开展了民歌采集活动，记录了 8000 余首民歌，最终通过筛选收录进《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卷》的歌曲共 432 首，其中 20 首是与刺绣相关的民歌，这些歌曲几乎遍布河北全境，涉及汉族、回族等地区。

这些与刺绣相关的传统民歌分属于小调和歌舞曲两类。小调是流行最广、蕴涵内容最丰富的民歌形式，歌舞曲是农村春节娱乐活动主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统称为“花会”）。

民歌描述的民间刺绣品如手绢、荷包、花鞋、耳包、针扎等物品，都是京津冀地区常见的传统生活用品，刺绣也是该地区女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冀中民歌《探亲家》唱道："亲家母你请坐细听我来说，你的女儿嫁到我家来，一张嘴光会说，什么也不会做。一双绣鞋做了半年多，提起来，这个日子可是怎么过。"这首歌讽刺新媳妇做不好刺绣，没有达到为人妻的基本标准。由此可见，女性具备刺绣能力是社会共识，它有时会具有一定的民俗约束力，被拿来衡量女性妇德。并且这一情况在民歌中并不少见，通过民歌的形式被人们记录传承下来，为后人再现传统乡村的场景和人们的生活理念。

二、民歌视角下民间刺绣在女性生命中的价值体现

与刺绣相关的民歌绝大多数都是"情歌"，而且是以女性视角对情感生活的直观表达。1949 前乡村生活困苦，由于经商、贫寒或遭荒年，有些外出谋生的津冀农民常年漂泊，甚至客死他乡，夫妻或爱人只能以刺绣物件来表达情意。歌词中的刺绣品等同于青年男女和夫妻之间无言的"情书"，是爱慕、思念等情感的化身，诸如大名县高跷调《绣荷包》前面九句都在讲绣英雄豪杰，最后一句用来点题明义："十把荷包全绣完，我的丈夫在外边，逃荒一去未回来。"京津冀民歌中刺绣的功能被定位为"情书"，这是民间刺绣创作的来源，表达出乡村女性对情感生活的追求。

三、民歌视角下民间刺绣素材的来源

正所谓"形式追随功能"，刺绣题材、纹样谱系等作为表现形式必然与创作目的之间存在因果性，所以刺绣纹样一般采用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原型，使生活在相同文化语境下的民众，不需要任何说明，彼此都能瞬间"看懂"纹样的意思，明白刺绣者的心意，并在广大民众之间被理解和认同。这些刺绣作品作为"情书"，其创作来源往往是女性群体喜闻乐见的事物，生活中的元素能够使她们以刺绣形式来表达情意。从目前收集的民歌歌词内容来看，作为"情书"的刺绣纹样看似繁杂多样，但整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顺应"农事节气"的"应景式"艺术原型，另外一类是来源于戏曲艺术中"爱情典范"和"道德英雄"的艺术原型。这两类艺术原型构筑出"生活""女人""男人"之间"情"与"礼"、"真"与"善"的多重文化关系。

（一）来源于生活场景的刺绣素材

京津冀民歌中记录的刺绣素材是采用写实性创作手法，以托物言志、写景抒情的方式，把与农事节气相关的艺术原型作为灵感来源，从牡丹花到荞麦花，从葫芦花到老倭瓜，借此来抒发对爱情的渴望。民间绣者都是农民，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她们顺应自然规律来进行生活劳作，重视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原则。诸如丰宁县《绣针扎》唱词："妹儿房中绣针扎，针扎面上绣鲜花，一年四季花。一到春天绣杏花，桃花开了鬓边插，芍药牡丹花。一到夏天绣桂花，芙蓉紧对玫瑰花，顺水漂荷花……"宁河地区的《打花棍》唱词："你这个针，我这个针，一心要扎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里蹦的、长胡子油葫芦花蝴蝶，介蛤蟆一身疙瘩，大肚子蝈蝈白菜心上爬，这些花草我也不爱，一心要扎冬瓜西瓜南瓜北瓜，压葫芦子葫芦老倭瓜。"在有情人眼里，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象征。民间刺绣利用这些元素表达了两情相悦的理想爱情状态，她们乐于分享田间地头美好的自然景致，因为这是她们谈情说爱的真实场景，见证了情投意合的恋人在劳动中培养幸福的爱情，充满真诚和朝气。另外，民歌中表达时间或数字的内容较多，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时间概念与传统的农业行为共生"，京津冀刺绣凝结着北方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农事经验，教化人们对天生万物存有敬意的朴素观念。

（二）来源于戏曲曲目的刺绣素材

纵观民歌中表达的刺绣内容，地方戏曲对民间刺绣的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地方戏曲秉承儒家思想，表达了"忠、孝、节、义"的思想，所以刺绣中"爱情典范"和"道德英雄"的原型就源自于戏曲中的"讲节之戏"和"重义之戏"。

1. 从张生莺莺到平贵宝钏："爱情典范"的艺术原型

"爱情典范"的刺绣内容来源于京津冀地区汉族、回族劳动妇女喜闻乐见的戏曲爱情故事，如昌黎县的《绣灯笼》唱词中的刺绣："上绣上张生下绣着莺莺，张生莺莺上边绣，粉皮儿墙上留诗，莺莺她爱张生；上绣上吕布下绣着貂蝉，吕布貂蝉上边绣，凤仪亭上相会，貂蝉她诉诉冤；上绣上秋胡下绣着罗氏女，秋胡罗氏上边绣，夫妻相会，就在那个桑园里；上绣上平贵下绣着宝钏，平贵宝钏上边绣，彩楼配啊，夫妻他们团圆；上绣上牛郎下绣着织女，牛郎织女上边绣，夫妻他们相会，就在那个七月七。"

戏曲的"节"戏中专有一类爱情戏，由于明朝中叶到清朝前期，戏曲作者多是饱读诗

书的儒学弟子，爱情戏渗透着儒学的精髓，同时他们又把握民间疾苦和诉求，表现了对人性的思考，肯定和歌颂爱情战胜天理的力量。爱情戏里面的原型可细分为“郎才女貌”爱情观的张生和莺莺，“生死相随”爱情观的牛郎和织女、薛平贵和王宝钏，还有“情投意合”爱情观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爱情原型体现了女子的贞节态度，同时也在倡导为了爱情的忠贞不渝去挑战传统礼教，赞颂“一见钟情”的自由恋爱。从民歌所处社会背景来看，传统社会中儒家礼教对于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未婚女性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在婚嫁方面要牺牲对爱情的追求，绝对服从家长包办的婚姻才是孝道。婚后妇女在婚姻关系上遵守“夫为妻纲”，“贞节”是规范妇女“人伦之大，风化之美”的最高准则。

该类爱情素材在民间刺绣中运用较广。从移情心理来说，这些艺术原型已经是爱情的化身，为乡村女性描述了理想化的爱情婚姻观，满足了她们对情感的幻想。“‘爱情原型’所凝聚着我们祖先的感受、思索、欢乐与忧伤，表达出了超个人的深层心理能量”。为此，这些艺术原型作为爱情符号已经成为集体共识，跨越时间长河，代代相传，成为民间刺绣中宝贵的素材。

2. 从“牧羊圈”到杨家将：“道德英雄”的艺术原型

京津冀“情歌”中还有一类专门赞颂英雄人物的刺绣，来源于戏曲中的“忠义之士”。诸如南皮县《王二姐思夫》唱道：“我给二哥哥绣个兜兜，水红里，面是绉绸，银锁链，如意钩。头一出绣上牧羊圈，二一出绣上那打彩球，三一出绣上桃花扇，四一出绣上粉妆楼。二哥哥有官无官回来吧，想死二姐女娇流。”这是京剧和河北梆子的四个曲目，“牧羊圈”讲述代叔从军的朱春登封侯归省与家人重聚之事；“打绣球”描述出身贫寒的薛平贵建功立业，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对他忠贞的爱情；“桃花扇”借明末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之情，写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之感；“粉妆楼”歌颂了除暴安良、扶弱济困的正义行为，同时交织后代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大名县的“高跷调”《绣荷包》唱道“一心要把荷包成，各样花草一个古人名，莺莺要把红娘唤；二把荷花绣了个得，孙二娘开店十字坡，打遍天下无对手；三把荷包绣寿诞，王母娘娘会群仙，各洞神仙齐来到；四把荷包绣四回，刘备关羽毛张飞，长坂坡前打一仗……”上述英雄都出自于京剧、河北梆子的曲目：霸王戏《霸王别姬》，三国戏《桃园

结义》《长坂坡》等。“道德英雄”艺术原型反映出一直留存在乡土民众心目中的“正义”形象，即使面对强权的摧残和压迫，也不能泯灭良知，必须实现“有情有义”“义薄云天”“肝胆相照”的道德境界。

从历史背景、地域环境而言，京津冀处在北方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的洪流中，自古有“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之称，是英雄义士辈出的地方。崇拜英雄义士的民风在民间刺绣中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戏曲渗透着儒学的精髓，引导乡土民众形成“重义轻利”“知恩必报”的价值认同，为了国家和群体利益彻底摒弃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我的生命，以“舍生取义”的行为实现对道德纯粹性的自律与自觉，才是强烈的趋善倾向，因而在民众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于女性而言，这些刺绣作品迎合了乡土社群构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适用在男性刺绣用品上，自然成为一种寄予情感的符号。她们特别偏爱“有情有义”的“道德英雄”原型，既忠贞于爱情，又胸怀大志，报效国家。借助“道德英雄”原型，把历史发展和抽象的道义具象化、生动化，使刺绣内容具备叙事性的艺术特征。“道德英雄”原型所具有的教化作用不光是针对刺绣女性，女性在家族生活中可以用刺绣的方式将“忠义”伦理道德传递下去，这些从民间绣品中都能感受一二。

上述两类原型表明，对于女性群体而言，民间刺绣一方面给予她们生命情感的“哺育”，提供了情感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建构了儒家的理想情怀和价值观念，强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感。在京津冀地区的民歌中，这两类民间刺绣原型广泛流传，它一方面反映出乡村女性群体“求真”的良知，同时流露出人性“求善”的道德观，“融真入善”的价值理念是由劳动女性共同心愿的反复积淀而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融合人性需求和主流道德价值的“共同感”可以跨越民族地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美国阐释人类学创始人格尔兹指出：“我认为人类就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一种富有意味的网上的动物。我所指的文化就是这些富有意味的网。研究文化并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美。” 民歌和刺绣都承担着编织这张网的任务，应该将它们作为生活“教科书”来解读，民间刺绣是民间自发的“美育”和“德育”活动，它与民族精神的关联是表和里的关系，可以成为培养民族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的有效手段。

【刊载】《民艺》2020 年第 4 期

家家乞巧望秋月，牵牛织女渡河桥——“我们的节日”七夕系列活动综述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更好地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引导作用，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期间，“我们的节日——2020 中国（新余）七夕民俗文化研讨暨展演活动”及“我们的节日——2020 中国（鲁山）七夕节”主题系列活动分别在江西新余和河南鲁山举行。

“2020 中国（新余）七夕民俗文化研讨暨展演活动”由中国民协、江西省文联主办，江西省民协、中共新余市委宣传部、新余市文广新旅局、仙女湖区管委会、同程集团承办。

8 月 24 日，专家组考察了新余七夕文化特色景观，并观摩了相关民俗活动。8 月 25 日，“2020 中国（新余）七夕民俗文化研讨会”及“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旅融合发展学术座谈会”举办。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江西省文联主席叶青，江西省作协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江西省民协主席李小军，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仰军，江西省民协副主席李黎虹，中国民协活动管理处处长李倩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相关活动。

邱运华在“2020 中国（新余）七夕民俗文化研讨会”上致辞。他表示，每个传统节日，几乎都有恒定的道德主题；每种民俗事象，几乎都是传统道德的表达；而七夕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蕴含着向往自然和谐、爱情美满、家庭幸福的价值理念，还凝聚着渴望智慧、追求工巧、激励创造等精神崇尚。因其如此，保护并传承节日民俗，就是尊重和珍视老百姓的生活传统和内心诉求，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文明之

根，就是传承和发展深深扎根于民俗大地上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余市近年来对七夕节以及由此衍生的七夕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可谓是人心所向、善莫大焉。

研讨会上，几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七夕节的文化意义和当代价值。

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探讨了毛衣女传说与新余文化的关系，认为应该将毛衣女传说浓缩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意象，用简洁明快的线条予以表达，使之成为这座城市的标识，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协“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放则讨论了七夕文化的当代价值。他认为，要重视七夕文化精神内涵的旅游资源式转化，具体来说，以星宿信仰、星宿观测、牛女传说为基础，设计系列旅游场域与旅游活动主题，空间如拜星台（观星台）、鹊桥、牛郎稻场的设置，活动如七夕星空遥望、七夕星神祭祀、观星题诗竞赛、人间鹊桥会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通过对“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探讨了区域社会秩序建构的叙事倾向。他认为，“牛郎织女传说”传递了渴望社会平等生活的基本愿景，通过叙事讲述了特定区域的生活方式、信仰形态，传递了民众的生活观、社会观和审美观。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罗秋菊分析了节庆活动的认同、记忆与传承的功能，从媒介文化的角度对旅游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培育社交媒体时代的粉丝社群，并通过新媒体手段来打造情感共鸣。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中心总规划师宁志中提到了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资源的四个路径，即通过创意化、产业链化、生态化、品牌化的方式，将地方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能产生经济利益的旅游品牌。

同程集团副总裁、同程文旅 CEO 王凯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后疫情下”文旅目的地的新机遇。通过统计数据，王凯指出，“人少、自驾、安全”成为当下旅游方式选择的关键词，未来农业、文化和旅游的结合，将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在 8 月 25 日下午举办的“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与文旅融合发展学术座谈会”中，陈东有、周文、龚志强等各领域专家继续为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话题展开讨论。万建中主持会议。

在七夕节当日举办的“七夕文化对话”直播活动中，万建中、萧放、林继富与甘肃省非遗中心副研究员封尘一同为网友带来了一场以七夕文化为主题的直播座谈。他们共同探讨了关于七夕的民俗活动和文化内涵，以谈话的方式，将屏幕前的观众带入了七夕文化的盛筵之中。

8 月 25 日，“我们的节日——2020 中国（鲁山）七夕节”主题系列活动在河南鲁山举行。本届七夕节包括开幕式暨文艺演出、“对话民俗”专家访谈、“搭鹊桥、促脱贫、奔小康”集体婚礼、鲁峰山“牛郎织女”山歌会、牛郎洞民俗表演等活动。其中，在“对话民俗”专家访谈中，王娟、夏挽群、许四妮、乔双锁等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定义七夕”“七夕节的真正源头是什么”“牛郎织女文化为何会兴盛于中原地区”等话题展开讨论。

据悉，2009 年，鲁山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多年来，鲁山打造“牛郎故里、爱情圣地”文化品牌，持续开展七夕节相关文化活动，举办了山歌会、曲艺民歌会、民俗展演、相亲交友等七夕相关民俗活动。

本次七夕节主题系列活动由中国民协、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民协、中共鲁山县委、鲁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根据邓立峰、乔军所撰文章综编）

“工艺集成黑龙江卷”调研聚焦鄂伦春民间工艺文化

8 月 5 日至 13 日，《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黑龙江卷》主编李军教授率编委会成员一行七人，深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十八站乡、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乡和黑河市爱辉区新生乡等地开展《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黑龙江卷》田野调查工作。

在首站塔河县，调研组先后考察了鄂伦春民间文化驿站和鄂伦春民族博物馆，并与鄂伦春族刺绣技艺传承人关小云，桦树皮画传承人朱波等民间艺人深入访谈。关小云在鄂伦春民间文化驿站藏录的三百余本文献史料，为田野调查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与此同时，调研组在当地与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吕军，中国民协会员联络与维权处相关同志，黑龙江省民协秘书长蒋丽丽等组成的考察团相遇。中国民协领导对调

研组的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关怀指导，并与塔河县当地文联负责人、民间艺人一道进行座谈，认真听取近年来当地关于挖掘、传承鄂伦春文化、驿站文化、森工文化、冰雪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的实践经验。

在十八站乡，调研组走访了国家级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郭宝林及其妻子戈晓华。郭宝林家的庭院俨然是一个私人陈列馆，墙上挂满各类实物、工具和上百幅狩猎、制船照片。调研组成员认真听取了两位传承人对桦树皮船制作技艺的介绍，并实地录制拍摄了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流程等资料。年近 80 的郭宝林老人不仅掌握桦树皮船制作技艺，还擅长鹿哨、悠车、骨头筷子等制作技艺，被誉为鄂伦春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

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乡，是鄂伦春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也是本次调研的重点。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国家级鄂伦春族民歌、省级鄂伦春族萨满服饰、鄂伦春族剪纸等六项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关金芳，省级鄂伦春族斜仁柱传承人孟淑卿，桦树皮制作技艺传承人孟彩虹、关桃芳等民间艺人家中进行制作技艺流程采录，获取了丰厚的即时资料。

10 日下午，调研组一行来到黑龙江省的口岸城市黑河市，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考察，先后在领上人博物馆、瑷珲历史陈列馆、中俄旅游陈列馆、爱辉区体验馆等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录制工作；同时还深入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实地走访了国家级鄂伦春族袍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长云，省级桦树皮镶嵌画传承人莫鸿苇，省级桦树皮制作技艺传承人陶丹丹，市级鄂伦春族桦树皮技艺传承人张玉霞等民间艺人。74 岁的葛长云老人充满深情地讲述自幼跟随奶奶学习袍皮制作技艺的经历，还亲自演示袍皮的熟制技艺，最后还为调研组热情地演唱了鄂伦春民族小调，调研在老人嘹亮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此次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做了充分准备，纪实采集采用录音、录像、照相和无人机拍摄等手段，较为全面地收录了黑龙江四小少数民族之一的鄂伦春族民间工艺全貌，为《集成》和民协工作打下基础。调研途径的各地市、县文联、民协及其领导对此次调研组的工作十分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

（转自微信公众号：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质量进度“两手抓”——《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青海“汇总大数据”

8 月 9 日至 10 日，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办、青海省海南州文联承办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2020 年工作推进会”在青海贵德召开。本次会议成果汇报与经验交流相结合，旨在对《中国唐卡文化档案》已提交各卷本文本进行专家审阅及评阅，制定各卷本提交时间，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仰军，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任徐岫鹃，中共海南州州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卫新华，中国民协副主席索南多杰，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冯宽以及谷晓恒、吴永飞、谢继胜、王建民、申尧、冯莉等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出版方代表和相关卷本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侯仰军、徐岫鹃主持。

邱运华指出，《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稳步推进项目实施。一是处在责编阶段、已经成熟的卷本，要提高效率争取尽快出版；二是比较成熟的卷本，加快编纂进度，争取尽快提交书稿；三是材料有所欠缺的卷本要继续补充调查拍摄；四是已启动但是管理上出现问题的卷本，要考虑重新制定工作方式；五是未立项或尚未启动的卷本是否立项或启动要进行充分论证。

徐岫鹃介绍了《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各卷本的实施情况，强调要通过本次会议交流经验，保证学术规范，提高唐卡项目品质，争取按时完成项目。

冯宽表示，目前项目处在“一喜一忧”的状态，喜在《甘南卷》即将出版，忧在时间紧任务重，还有部分卷本亟需进一步丰富完善，要对现有卷本进展情况进行分类管理，规范项目流程，早日完成这一重大项目。

青岛出版社艺术出版部主任申尧就《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的出版体例、编纂规范等提出建议，要处理好体例和调查的矛盾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严格按照课题组的学术规范，保证文稿质量，加快出版进度。

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唐卡项目负责人冯莉汇报了部分卷本的文本书写情况，希望通过专家对文本的评议，在各卷本负责人的继续努力下，促进各卷本顺利完成。

《甘南卷》《藏娘卷》《年都乎卷》《拾零卷》《德格八邦卷》《阿里卷》《拉萨卷》《苯教卷》各卷主编和负责人就各卷本情况分别进行汇报。

唐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谢继胜、王建民等就各卷本稿件情况，从文化档案的定位、文本体例、章节结构、卷本特色、图片规范等角度与各卷本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现场考察了贵德县圣宝唐卡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贵德县创业孵化基地、藏巴拉雪域文化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和布绣噶玛公司。

（李航）

贵德“天地人”　细说“六月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及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倡导、中国民协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青海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的节日·贵德六月会”专家采风研讨活动于 8 月 10 日至 12 日在青海省贵德县举行。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协、青海省文联、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中共海南州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民协、中共贵德县委、贵德县人民政府、海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海南州文联、海南州广播电视台承办，贵德县文体旅游局、贵德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贵德县河西镇人民政府、贵德县常牧镇人民政府、海南州影视艺术协会协办。

8 月 5 日起，海南州电视台全程拍摄“踩神”“下庙”等贵德六月会娱神祭祀仪式；10 日下午，专家组奔赴贵德县常牧镇周屯村及河西镇下排村实地考察六月会祭神民俗活动及周屯村史博物馆；8 月 11 日上午，考察了“两神相会”“谚语大赛”“拉伊对唱”以及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说唱等民间文艺活动。

学术研讨会 11 日下午召开，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青海省文联副主席谷晓恒，贵德县委副书记、县长安木拉，中共海南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海南州文体

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葛文军等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安木拉致欢迎辞，省内外专家及乡贤代表 14 人发言，邱运华作学术总结。会议由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侯仰军主持。

邱运华表示，贵德县域古村落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通过实地考察深刻感受到州县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屯村史博物馆的做法值得有历史传统的村落学习。贵德地区大到区域文化，小到村落文化，有着良好的传承基础。他强调，地方文化的发掘、抢救和保护既是地方文化学者的职责，同时还要放到更大范围内去做，要放到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中去讲，为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强学术研究工作，呼吁更多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介入对“贵德六月会”的学术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就“我们的节日”概念及实践做了深度诠释，并结合贵德地域历史文化与“贵德六月会”，深入探讨了民间信仰、宗教、民俗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和意义，充分肯定了贵德县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并对由此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积极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宪昭、毛巧晖分别从少数民族神话和甘青民族走廊角度，对二郎神和文昌神信仰的流布与特点进行深入阐述，强调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贵德地区的重要性，认为“贵德六月会”和“二神相会”仪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鲜活案例。

原海南州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多杰才让就青海藏区文昌神信仰与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关系渊源，以及田野调研所获取的相关信息作了深入分析，提出应该进一步加强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看本加结合个人多年调查研究成果，以“从文昌神到阿尼尤拉：一位中原神灵在雪域藏区的本土化考察”为题，从传播空间、庙宇建筑、形貌特征等方面深度诠释了文昌神在藏区的本土化过程、表现形式及文化学意义，并延伸了“中心—边缘”、包容性与多元性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启示。青海民族大学教授唐仲山就明初“贵德十屯”的设立对汉文化在同仁、尖扎和贵德地区的传播与融入、“二神相会”的“甥舅关系”、贵德六月会体现出的“神圣与世俗”融合意义提出了思考命题。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文忠祥围绕贵德六月会、热贡六月会、民和土族纳顿和甘肃同类文化事象，就甘青农事

文化祭祀带文化特质上的共同性，从表演程式、屯际关系、文化传播互动与融合等方面阐释了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区域特色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毕艳君作为贵德籍学者，认为贵德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地，需要本土学者和相关学科专家做深度挖掘和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升贵德特色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旦正加提出甘青藏区流传的文昌信仰是文昌信仰的本土化结果，贵德是藏区文昌信仰的发祥地，而文昌信仰自元代以来在汉藏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在相关的文献学、图像学和建筑学资料中得到了佐证，不断丰富的文昌信仰研究成果将对特色文化景点的打造、文化品牌形象塑造、知名度的提升和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青海藏族民俗》主编侃本结合贵德六月会研究文献和二郎神信仰在青海各地的传播情况，就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与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关系做了阐述。贵德籍文化名人罗子勇结合文献和口碑资料，对文昌神和二郎神在贵德地区的传播、庙宇、祭祀仪式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多元文化融合对增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中国民协供稿）

重走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之路

8 月 6 日至 7 日，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纪念活动暨考察成果出版座谈会在广西省柳州市三江县举办。中国民协、广西自治区文联、柳州市、三江县的领导、文化专家重走 1986 年中芬联合考察之路，并就重新整理后的考察文献进行座谈交流。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中国民协副主席、广西民协主席韦苏文，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广西柳州市文联副主席吴桂贞，三江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吴志峰以及相关领导专家出席活动。座谈会由韦苏文主持。吴志峰代表三江县委县政府致欢迎辞。吴桂贞对考察活动进行了回顾。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干部楼一宸介绍了考察文献整理编辑情况。

侗族文化专家、90 岁的杨通山发言表示，作为参加过 1986 年中芬联合考察三江地区

的代表，如今看到这批文献能够再次出版，并且内容十分丰富，内心十分激动，也十分期待。万建中认为，中芬联合考察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这批文献的出版对于学术界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档案部分，详实记录了考察的全过程，对当下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也有借鉴意义。同时，他对接下来的修改提出了遵循现代学术规范的建议。

会上，全体与会人员对编纂原则、目录分类、地方文化要素修正等方面开展了热烈讨论。来自当地的侗族歌手也表演了三江侗族特有的民歌，令大家大饱耳福。

邱运华作总结发言。他指出，中芬联合考察是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接轨的生动表现。这批文献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是一次对三江侗族文化的集中宣传展示。它体现了我国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视，也彰显了侗族人民的文化自信。这批文献的出版，也将作为中国民协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成果。

主要参会人员沿着 34 年前的足迹，重走中芬联合考察之路，对三江县林溪镇、八江镇等地进行补充调研，并将最新成果融入文稿编辑之中。三江县文联将组建联合审稿小组，对初步编辑文稿进行审阅。

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由中国民研会（中国民协前身）于 1983 年 9 月动议，1986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举行，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联合对民间文学进行考察，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民间文化保护典型项目。当时，中国和芬兰近 60 名专家学者对三江地区的民间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开展了实践性极强的学术交流。

通过当时的考察，不仅有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问世，而且双方学者调查和记录了大量民俗事象、民间文学作品。这一批珍贵的资料，经过了近一年的整理编目、数字转化，形成了初步编辑稿，即将进入出版流程。

（楼一宸）

民协移动会客厅标配“互联网+民间文艺”

8 月 4 日，首期中国民协会客厅暨 2020 年新入会会员培训班网络直播教学班活动在

京举行。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邱运华主持“山花烂漫七十年”专题访谈，为本次活动拉开了序幕。

访谈中，邱运华与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北京大学教授陈连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等四位知名专家一起，围绕“民间文艺发展七十年之所见”“民间文艺如何‘活’进现代生活”“新时代民间文艺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三个话题，系统回顾了中国民协 70 年发展史，展望了新时期民间文艺发展新画卷，畅谈了中国民间文艺未来发展的锦绣蓝图。邱运华表示：2020 年是中国民协成立 70 周年，作为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中国民协始终积极引领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民同向同行，在与新中国同呼吸、共成长的进程中，坚守田野、深入生活，“用心传薪火、用脚做学问”，高高擎起世代相传的民间文艺火炬，持续发挥民间文艺在“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使民间文艺成为浇灌人心向善、风俗醇美的清泉。四位专家表示，中国民协 70 年的发展历程和人民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民协开展的“我们的节日”活动，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发展推动力。未来中国民协要更进一步地为民间文化代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向民间文艺从业者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在随后的直播教学活动中，陈连山、萧放、林继富三位教授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分别以“民俗学的民众观”“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民间文学与共同体认同”为题，为广大会员带来了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时代特征，更对发展民间艺术具有很强指导性、实践性的精彩课程。活动收到了民间文艺工作者和会员的广泛好评，艺术报、抖音直播关注度到达 7000 余人，点赞 700 余人，直播平台和学员微信群累计评论上千条。很多观众留言，网络直播教学方式新颖、学习便捷，会客厅活动更是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给他们的创作、工作提供了许多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非常期待下一期“民协会客厅”的开播。

“民协会客厅”是中国民协 2020 年的一项特色活动，也是更好地推动协会切实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新职能，努力拓展会员联络、服务渠道的新举措。今后，“民协会客厅”将作为常设场所，坚持秉承引领会员、服务会员的宗旨，接待会员来访办事，并配合星级会员考核邀请优秀会员做访谈，讲述全国各地的民协故事、

会员故事等。此外，协会还将在抖音、爱奇艺、bilibili 等平台建设“移动的民协会客厅”，定期邀请民协主席团成员、理事会理事、会员代表，打造“互联网+民间文艺”快车道，精选民间文艺作品，讲述精彩故事，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传播民间文艺知识，持续提升民协关注度和影响力。

（蒋巍）

脚下有泥 心中有底——甘肃河西走廊民间文化资源富集

8 月 13 至 18 日，中国民协组织了沿河西走廊的民族民间文化调研活动，先后在甘肃省兰州、武威、张掖、嘉峪关展开了民族民间文化专题调研，深入调研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现状、民间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民族地区唐卡创作等地方民族民间文化情况。

调研组由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带队，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任徐岫鹃，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马青山，甘肃省民协常务副主席杜芳，中国民协《中国唐卡文化档案》课题组负责人冯莉，以及《中国艺术报》专题部副主任张志勇、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干部楼一宸等同志参加了考察活动。

在兰州市，调研组集体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艺术馆的“数字敦煌”，对甘肃历史文化、古丝绸之路文化带、沿河西走廊各民族民间文化交融发展进行了全面了解。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地区，也是中外文化频繁接触、共同促进的咽喉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呈现特别突出，博物馆以实物的形式表现了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交融影响的进程。“数字敦煌”以高科技手段原样复制了敦煌石窟艺术，使观众能够打破石窟参观的时空限制，更为自由和更有机会仔细观赏石窟艺术，体会石窟壁画里蕴含着的民族民间文化内容；数字化技术和呈现方式引发了调研组成员的浓厚兴趣，对民协“两大工程”和系列重大文化活动的推广宣传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在武威市，调研组考察了中国早期石窟代表天梯山石窟和凉州宝卷传习所、青铜铸造工艺经典“马踏飞燕”、青铜器战车、大型砖石墓葬雷台汉墓、“陇右学宫之冠”武威文庙以及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寺，各民族民间文化高度融合成为河西走廊文化带鲜明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武威市凉州区天梯山石窟附近的村子里，一个传习所的民间艺人表演了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凉州宝卷，对调研组触动很大。这些民间艺人自发地坚守和传承民间宝卷说唱艺术，组织演出，收集保护宝卷文本，体现出对自身文化的强烈情感。

在张掖，调研组参加了张掖市民协主办的民俗文化传承基地揭牌仪式、张掖市民协“高手在民间”活动成果发布会，邱运华代表中国民协发表讲话。调研组集体参观了河西民俗文化博览园，文化旅游结合发展的“张掖经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调研期间，调研组与张掖市宣传文化部门、文联、民协、民间文艺传承人、文化企业家等进行了座谈，听取当地文化、民间文艺、“非遗”传承保护等有关情况交流汇报，尤其对民间文艺发展遇到的困难、民间文化的传承等问题与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邱运华表示，河西走廊历史悠久，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地图上具有重要意义和持久价值；张掖地区具有多样性民族文化，民间文艺种类齐全，特点鲜明，这是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的结果，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民间文艺的发展应继承传统，但不应拘泥于传统，应该积极探索利于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传承人发展的多种途径。邱运华还介绍了中国民协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和山花奖评审、“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中国民间文艺之乡、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等。

调研组还实地调研了嘉峪关长城，通过参观长城博物馆，系统了解了全国各地的长城保护现状，认真体会长城文化的重大意义。调研组还走访了大漠风情石艺馆，深入了解中国民协会员盛爱萍的石艺画艺术特征和创作历程。

中国民协一直以来坚持“学术立会”的传统，倡导实地调研与理论相结合。通过本次调研，中国民协调研组一行对极具特色的河西走廊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更加深刻体会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同时也加强了与甘肃省基层文联、民协的联系，为今后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民协供稿）

·国际信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化国家文化遗产法律数据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文化遗产法律数据库（NATLAWS）是旨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各国法律数据库，是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的国际工具。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数据库的在线访问进行了优化。用户可根据关键词、名称、国家或出台年份在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并获取各个国家重要的相关信息，如负责文化物品出口的国家主管部门联系方式或主管部委基本信息。数据库中的法律法规涵盖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水下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各会员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提交的国家法律纸质档案已经过数字化并存入数据库。

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更新该数据库的新项目。工作包括对现有所有文件进行高清扫描，并改进数据库界面，方便用户使用。清查缺失法律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文化遗产法律的综合索引也得以创建。瑞典和瑞士政府的财政支持使这一全面优化成为可能。

国家文化遗产法律数据库总共收录 3022 项不同的法律、法令和修正案，用户不仅可以方便地获取法律的名称，还可以获取文件的内容。数据库更新项目不仅将促进和扩大各国文化遗产立法工作，还将保护这些档案所代表的记忆遗产。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辑录：陈婷婷）

◆巴中文化交流新期待

8 月 26 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兼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和清会见巴基斯坦文学院院长尤素福·胡什克（Yousuf Khushk）博士，双方就加强语言、文学、翻译出版等领域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尤素福·胡什克欢迎张和清莅临文学院，他热情回顾了文学院与中方交流合作的精彩历史并表示，巴中在文学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历史悠久、频繁活跃，巴中作家代表团互访已成为双方文化交流领域的品牌项目。此外，双方作家、诗人、学者等还积极踊跃参加对方

举办的文学活动及研讨会等，巴文学院也积极致力于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乌尔都语或其他影响深广的巴基斯坦方言，如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等。希望双方能在中巴《文化协定执行计划（2018—2022）》框架下，携手同心，进一步推动文学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张和清感谢巴基斯坦文学院对驻巴使馆文化处、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并对尤素福就任巴基斯坦文学院院长表示祝贺。张和清表示，中巴是“铁杆”兄弟，中方乐见中巴文学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势头，中国驻巴使馆文化处及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愿积极推动双方在文学、艺术的经典作品互译出版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中巴《文化协定执行计划（2018—2022）》落到实处。

巴基斯坦文学院成立于 1976 年 7 月，是巴联邦政府国家遗产和文化署下属的自治性政府机构和巴语言、文学等领域研究的国家级学院，是巴基斯坦最大、最负盛名的学术团体之一。尤素福·胡什克博士系巴著名评论家、乌尔都语语言文学领域功勋教授，其于 2020 年 3 月上任巴基斯坦文学院院长，任期 3 年。

（来源：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处，辑录：陈婷婷）